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讯

2016年第一期

总第一期



#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 通讯

2016年11月 总第一期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刊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讯》

刊期：总第一期（2016年9—10月）

执行主编：杨弘博 韩笑

编辑：孟繁之 谢宁

编务：陈天传 关雪

摄影：刘学红 吕萃 杨扬 等

装帧设计：王瑾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电话：010-62768010

传真：010-62768010

邮箱：ihss@pku.edu.cn

网址：<http://www.ihss.pku.edu.cn/>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 致辞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北大文研院”），是以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为主、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学术机构。

文研院的宗旨是“涵育学术，激活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依托北大的综合优势，立足于服务学术，服务学科，服务学者；守正出新，培育“净土”，引领风气；弘扬人文与科学精神，优化学术生态。致力于切实凝聚，深度交流，建设更有竞争力的学术队伍。我们希望“近者悦，远者来”，促进与海内外学界的研究切磋，力求凝聚多方学术精华，探索社会发展与文明振兴的道路。

人文社会科学，面对丰富复杂的人类社会，反思曲折与成就，注重思辨与洞察。其活力与未来，取决于蕴蓄的广度与厚度，取决于探求的素养与能力。代代北大学人追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抱定宗旨，砥砺德行。路漫漫其修远，希望正在将来。

2016年9月20日





# 目录

## 01 学术委员会

## 07 工作委员会

## 11 北大文研院筹备恳谈会

## 17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暨系列活动

## 23 特邀访问教授

- (一) 樊锦诗 24
- (二) 黄进兴 24
- (三) 安德鲁·阿伯特 25
- (四) 木山英雄 25

## 27 北大文研学术

- (一) 北大文研讲座 28
  - [01] 樊锦诗：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 28
  - [02] 黄进兴：历史的转向 30
    - 20世纪晚期人文社会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
  - [03] 安德鲁·阿伯特：作为理念的学术和作为日常工作的学术 34
  - [04] 李零：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 37
  - [05] 夫马进：巴县档案中所见的中国清代乡村社会的“自治” 41
  - [06] 坂元弘子：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之后的省思 43
  - [07] 约恩·吕森：历史之思 46
    - 面向未来的视角
  - [08] 李弘祺：善书、道德反省与宗教伦理 48
    - 近世中西方法的异同
  - [09] 王笛：被遗忘的调查报告 50
    -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后面的故事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52

- [01] 易平：自由的海洋，还是封闭的海洋？ 52
  - 古典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洋秩序
- [02] 叶少勇：万法皆空 54
  - 佛教哲学中“空观”的起源与沿革
- [03] 程苏东：拾遗补艺，整齐百家 55
  - 《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
- [04] 郝煜：雍正朝火耗归公与国家能力 59
- [05] 孙飞宇：西斯廷的圣母与多拉的神隐 62
  - 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研究

## (三) 北大文研论坛 66

- [01] 樊锦诗：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 66
- [02] 尾崎文昭：周作人思想的分析试探 68
- [03] 黄进兴：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及其衍生的问题 71
- [04] 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 73
- [05] 包乐史：比较视角下的莱茵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75
- [06] 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的学术与思想 77
- [07] 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 80

## (四) 静园雅集 84

- [01] 王风：琴史、琴器、琴曲——古琴漫话 84
- [02] 祁小春：王羲之的《十七帖》诸问题 86

## 91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会

- (一) “中华文明与世界”主题研讨会纪要 92
- (二) “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主题研讨会纪要 95
- (三) “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主题研讨会纪要 99
- (四) “西学在中国”主题研讨会纪要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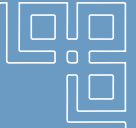
## 107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专题展览

## 111 北大文研纪事





## 学术委员会



## 学术委员会

北大文研院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具备高水准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声誉，具有广泛的学科代表性。学术委员会的职责为审核、修订文研院章程；确认文研院的学术导向及目标；审议文研院学术发展规划；审议文研院年度预算和决算报告等。



### 蔡洪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产业组织；博弈论；公司金融



###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央文史馆馆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山大学顾问董事会成员  
华东师范大学等十几所国内名校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现代中国文学、教育及学术



### 李零

北京大学教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研究领域：**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



###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



###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七届成员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研究领域：**中外关系史；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华美国学会荣誉会长  
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国际政治



###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  
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馀所高校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治理



### 张旭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文讲席教授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批评理论中心（ICCT）主任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国际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  
重庆大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Frontier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荷兰 Brill 出版）主编

**研究领域：**文学理论；现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美学；政治哲学





###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  
**研究领域:** 西方哲学



###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委会主任  
**研究领域:** 新石器商周考古



### 朱青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世界艺术史大会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中国美院、西安美院、天津美院、四川美院、鲁迅美院、广州美院、湖北美院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 艺术史



###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馀所高校法学院兼职教授  
**研究领域:** 法学理论；法律与社会科学；法律与人文



### 陈来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中华朱子学会会长  
中国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儒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研究领域:** 中国哲学；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



### 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资深特聘教授  
**研究领域:** 东亚及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宗教史



### 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院士、特聘研究员  
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  
*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Asia Major Editor  
**研究领域:** 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



### 巫鸿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主席  
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调查与数据中心荣誉主任  
纽约大学艺术中心顾问委员会主任  
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亚洲艺术委员会成员  
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顾问委员会成员  
何鸿毅家族基金会顾问委员会成员  
**研究领域:** 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史



### 谢宇

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  
《社会》英文刊主编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所 Bert G. Kerstetter'66 大学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办公室研究员  
美国国家科学院 / 国家研究理事会院士  
**研究领域:** 社会分层；研究方法与统计；人口统计学；科学社会学；中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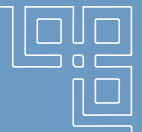


### 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  
李国鼎经济发展讲座教授  
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成员  
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咨询委员会成员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Senior Associate Editor  
**研究领域:** 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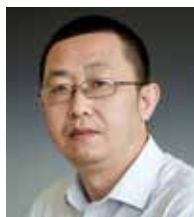
## 工作委员会





# 工作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由北京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组成，具有学科代表性。工作委员会的职责为制定文研院学术发展规划草案；组织实施各项学术活动；遴选邀访学者并评审研究成果；参与商讨文研院日常行政事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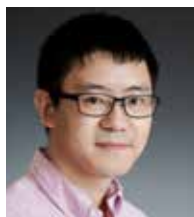


### 高峰枫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系主任  
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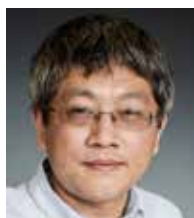
#### 研究领域:

早期基督教；圣经与西方思想传统



### 韩笑

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专家办公室副主任  
“大学堂”讲学计划主持



### 李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副主任  
北京大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伦理学；古希腊哲学；早期现代哲学；社会理论



### 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  
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研究领域:** 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



### 陆扬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学业主任

**研究领域:** 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佛教史；现代史学理论



### 孙庆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

**研究领域:** 中国青铜时代考古；考古学史；中国古代玉器与玉文化



### 邢滔滔: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挂职）

**研究领域:** 数理逻辑；数学哲学；宗教哲学



### 叶炜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研究领域:** 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 张辉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副主任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执行主编

**研究领域:** 中德美学与文学关系；文学解释学（兼及《诗经》解释史）；文学与思想史



### 张亚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院长助理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秘书长  
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 中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学术史；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



### 周飞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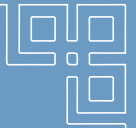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副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 城乡社会发展；中国社会思想史





北大文研院筹备  
恳谈会





## 北大文研院筹备恳谈会

会议主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筹备事宜和发展方向

会议时间：2016年5月5日、5月19日、6月10日三次筹备恳谈会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自2013年成立至今，已有三年时间，但过去的工作成效尚不显著。目前校内外迫切希望北大能弘扬真正的人文精神，提供沉稳深厚的人文气象，希望文研院的活动能有所推进，真正搭建一个既能够涵育学术又能够激活思想的跨院系平台，并借此对院系的学科建设予以支持、补充和提升。由此，文研院邀请学校领导及众多著名学者，分别于2016年5月5日、5月19日、6月10日举行

了三次筹备恳谈会，恳谈会由邓小南院长主持，与会者就文研院的发展目标、工作内容、机构建制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林建华校长从学校角度就文研院的未来发展发表重要讲话。林校长首先介绍了他曾参与建设的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经验。基于兄弟高校的经验，林校长从学校和学者的角度给予北大文研院三点意见：一是北大人文社科基础强，文研院应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出席恳谈会

有效结合现有学科，充分利用良好基础；二是北大文研院应能聚集核心领域的世界级人才，共同探讨重要问题，提升中国和北大的世界影响力；三是促进青年学者成长，高校院系培养两种人，即学生和年轻教师。好的学院能开拓年轻人的视野，通过交流让青年学者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林校长还指出，为促进文研院切实发展，学术活动及讨论会可以多种形式展开；可以邀请国内外学者驻院研究，要有青年学者，也可以有博士后。文研院将给校内、国内及世界提供一个连接和交流的平台。另外，关于文研院的未来方向，我们研究自己和学习西方的同时，更要为国家和政府在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和民生等方面提供更深层次的建议。

校长助理王博教授指出，目前学校对于文研院的设计是既实又虚，实即有非常好的空间和资金资源提供给文研院开展活动，虚则不设教学、科研编制，以避免同院系造成竞争关系。王博教授还指出文研院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工作方向就是把人聚起来，通过“近者悦、远者来”的方式，首先把北大不同学科的学者集聚起来，让他们喜欢在这个平台做事情，之后再逐步吸引国内乃至全世界的优秀学者。王博教授认为，文研院未来工作的核心关键词是“基础”、“交叉”与“连接”。“基础”意味着要立足于北大深厚的基础研究之上，不做应



林建华校长（左）和邓小南院长（右）

应用型、智库性质的工作；“交叉”则是利用文研院的平台促进人的交流和沟通，以及学科、知识的交流和沟通；“连接”则是指连接不同背景的学者，对学科发展产生刺激并形成新的创造力。王博教授希望文研院能在院系之外、在学校层面上起到引领作用，向外也能展现出北大文科的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成为一个多元的、自由的，追求学术和真理的平台，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地方。

渠敬东教授通过“学科”、“学术”、“学者”三个方面的关系，对文研院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言：文研院本质而言是要为基础学科服务，但要把基础学科的原理和边界突破，就需要做到跨学科，文研院的任务便是营造一个讨论和交流的环境；学术是超越学科的概念，涉及到学术传统、学风、学养、环境的宽松度等问题，这都是文研院未来需要努力的；最后，文研院最核心的还是学者的支持。

参与会谈的各位学者，均赞成文研院的工作内容应当以人文为核心，以基础学



科为主，这既是对当前学科发展大背景的要求，也是北大的使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也认为目前学术界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只有北大还有可能保持一些学术的“范”而不被侵蚀；各个学校人文学科里还有一批学者在自己的领域里苦苦地坚守，特别是年轻学者，坚守可能意味着要丢掉很多宝贵的东西。他希望文研院能为这些学者提供寄托和栖身之地的平台，让他们可以在学术环境中找到同道，给他们希望。李零教授、彭刚教授、彭小瑜教授、朱良志教授、朱苏力教授都认为，文研院应当成为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平台，能使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这个平台相互激发，做到在原本院系想不到和做不到的事，通过交叉来拓展新知识。荣新江教授认为，北大的人文社科学科交流比较少，文研院正是促进各位学者交流的有利契机。他建议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打破北大过去形成的闭守的风气，这一建议获得了阎步克教授、张旭东教授的赞同。

文研院的工作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彭刚教授指出，“安静”，即为学者创造一个脱离桎梏的学术环境，是文研院工作应当格外注意的。罗新教授认为，文研院的发展必须依托现有的学科院系，从中汲取资源。彭小瑜教授指出，文研院一个非常重要且务实的任务就是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北大起到补苴短板的作用。文研院可作为校内的人才库，设立一些可以快速启动的项目，弥补各院系在某些学术方向上的不足。

文研院的工作目标需要凭借一系列制

度性建制来实现。与会的各位学者分享了各自所见所闻世界各地高校高等研究院的成功经验，为文研院的发展献计献策。陈平原教授认为，虽然当前国内各种高等研究院遍地开花，但真正能做好的并不多。较好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依凭其院长的学术影响力，凝聚出核心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思勉研究院则通过博士后驻院的形式，成为该校年轻教师的蓄水池。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梁治平研究员指出，文研院院长的人选一定要非常谨慎，选定后要给院长足够的权限和资源。陈平原教授担心北大文研院目前的目标和方向不够明确，进而无法着手实际工作，起不到领头羊的作用。如果做不出几个重点项目或者建立有效的运作模式，那么文研院将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邓小南教授则指出，过去北大曾经有许多活跃的小范围的学术活动，如学术沙龙等，但因种种原因未能长期进行下去。文研院应作为一个跨越系科的平台，将这些好的学术活动形式扩大面积，使其固定化、常态化，让各系和老中青教师均能充分受益。我们不设定某个具体目标或一定要限期完成某些任务，凡是认为真正需求的、有价值的活动，文研院都应当为其搭建平台、提供通道。平新乔教授也特别指出文研院不应当做一些过于热门的内容，也不要急于出成果或者搞评审和审查，但是在选人上必须慎重，要让有同样志向和兴趣的人聚集在这里，而非吸引想追逐个人利益的人。荣新江教授也认为文研院应当成为学者静心思考和培训、提升青年教师的平台。

赵敦华教授认为，北大文科基础实力雄厚，一定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在这些深厚的资源之中要特别注意两类人：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于有潜力的年轻人，应当重视他们的想法，并在文研院的平台上为他们提供机会。对于学术素养极高的退休老师，也可以请来文研院让他们继续自己有价值的项目，用便利的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赵辉教授、王奇生教授、刘云杉教授及社科院文学所刘宁教授都注意到了学术传承的问题。王奇生教授指出，对人文社科而言，“高龄”的学者十分可贵，希望文研院能够重视这些“老先生”，成为各院系退休精英继续研究的“特区”；并希望文研院招徕一些博士后、博士生等，传承这些老先生的学问。谢宇教授亦赞同文研院可以招一批年轻学者驻院，同时安排院系中的资深学者进行联合培养，给年轻人固定的资源，以利于他们的发展。李强教授也指出，做纯研究性质的研究院很难成功，经验证明类似机构往往一开始很热闹，但越做越艰难。厦门大学历史学系郑振满教授则认为文研院应当更多学习德国的哥廷根研究所，哥廷根就是以项目制为核心，所长与副所长分别负责两个项目展开一系列活动。同时也请一些博士后和博士，但这是在非常严格的考核标准下进行的。

张旭东教授介绍了自身在纽约大学高

研院的经历，他认为纽约大学高研院的成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纽约大都会的城市背景和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提升了影响力；其次，作为纽约大学招聘年轻学者的传送带，通过培养博士后留住了大批人才；另外，纽约大学高研院的活动有很强的主题性，以三年为一个时段确定一个大的学术主题，每年再设立一个相对小的主题，之后高研院就围绕这大小主题从各个角度展开系列活动。张旭东教授认为这样可以使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参与进来，能够吸引人气，对校内文科整体氛围的影响也比较显著。李强教授指出，文研院最早的设想是仿照芝加哥大学思想委员会来建制，即有三分之一有编制的学者长期驻院，三分之一的学者与院系双聘，另外三分之一为短期驻访学者。这些经验都值得文研院借鉴。张鸣教授通过介绍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经验，特别提出了办杂志的建议。

浙江大学朱天飏教授通过介绍浙江大学高研院的办理经验，提出了一些相对具体的建议，如给学者提供充分的治学空间，提高吸引力，培养具有服务精神、热爱这份工作的行政团队等。袁明教授则提出“区域研究”这一研究议题，正可以作为文研院研究工作未来的“抓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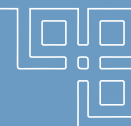
（撰稿：秦鹏飞）







# 北大文研院 揭牌仪式暨系列活动





##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暨系列活动



2016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正式揭牌仪式。与揭牌活动相配合，文研院还举办了两场精品展览、两场主题演讲和四场主题研讨。揭牌仪式隆重而盛大，学术活动严谨而活跃，系列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两场精品展览，用最切近学术本身的方式，为文研院的揭牌仪式进行了预热。9月10日，由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主办的“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巡展”在赛克勒博物馆开幕。作为北大文研院特邀教授的樊锦诗教授，将通过现代数字技术复制并喷绘而成的40余幅壁画精品和部分复制塑像、洞窟，从她工作了五十余年的甘肃敦煌带到母校北大，为北大掀起了一股“敦煌风”。9月13日晚7点，北大文研院在二体报告厅

举办了“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讲座，樊锦诗教授为到场师生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再次加深了北大师生对敦煌文化艺术宝库的了解。

此外，为纪念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0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于9月19日至23日联合举办了“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胡适先生与北大相关的珍贵图片、信笺、手稿和北大图书馆珍藏的部分图书资料，并配有详细的生平年表、文字阐释和视频展示，充分展现了胡适先生的治学轨迹和思想脉络，为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提供了近距离接触学术大师的机会。

9月20日上午10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来自全国政协、教育部、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和北京大学

等单位的领导和嘉宾，同中外学者代表一起参加了本次揭牌仪式。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教授担任本次大会的主持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致辞中详细阐述了“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并提出了未来的学术规划、学术构想。

此后，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青森、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分别讲话，他们高屋建瓴，充分肯定了北大文研院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作用，对文研院在人文社科领域进行的探索表示期待，也对文研院未来的方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和希望。

之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共同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宣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工作委员会成员名单。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和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代表兄弟院校嘉宾讲话。两位校长从学校工作的角度出发，为北大文研院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随后，复

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代表中外学者发言，他们从学者自身的角度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揭牌仪式的最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与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水校友，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基金签署捐赠协议。

揭牌仪式之后，文研院特别邀请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分别发表主题演讲。安德鲁·阿伯特教授在题为《作为理念的学术和作为日常工作的学术》演讲中介绍和评价了与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几项核心建制，即社科领域中的跨院系分工、核心课与文明课体系，建立学术委员会和保障学者权利等等。随后，安德鲁·阿伯特教授总结了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领域长盛不衰的关键，即树立深刻的学术理想，坚持培育人才，珍惜那些认同大学理想的核心师资。此次演讲为北大文研院乃至高校同类机构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和实践上的指导。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出席揭牌仪式并发表讲话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共同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演讲现场

随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进行了题为《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自“西周的邻居与后院”讲起》的演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唐晓峰教授和考古文博学院徐天进教授应邀担任讲座评议，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担任主持。在演讲中，李零教授从具体而微的角度将“中国”的命题还原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即西周大一统之中。之后，李零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将以西周为中心形成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族群比喻为西周的“四合院”，利用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勾画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并形塑中华文化的历史图景。

9月21日上午9点30分至12点，北大文研院分别在静园二院、四院同时举办了四场颇具特色的主题研讨。这四场研讨分别邀请到中国学界多方面的顶尖学者，让他们运用北大文研院搭建的良好平台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第一场“中华文明与世界”主题研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召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为主要发言人。葛兆光教授发言的主题为“中国文化理解与研究中的难题”。他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指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研究遇到的界定之难、多元一体的考辨和中国文化史书写的困惑。

接着，钱乘旦教授做了“文明多样性与文明的回归”的主题发言。钱教授主要从人类文明的源头讲起，以大量史实介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和演进，指出文明多样性是永恒的主题，并在最后提出了“文明回归”的重要概念。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就文明的世界性、文明多元一体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二场主题研讨“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召集，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

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讲。陈来教授首先强调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出作为学术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既定成见的自由；作为教育方向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技术理性的自由；作为道德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感性世界必然的自由。

陈平原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他首先梳理了中国“学在民间”的传统，随后，他谈及了人文学在最近三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所面对的困境。陈平原教授最终将自我定位于“挣扎、徘徊、游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之后，与会学者在深入探讨了社会转型期人文精神的走向等重要议题。

第三场研讨会以“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为主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为召集人，台湾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为主要发言人。黄进兴院士在发言中首先以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为例，介绍了存在于史语所中的“学术传统”和传统中的变化问题。随后，黄先生又以他所治的思想史领域内的发展为例，谈到了“范式转移”问题。

荣新江教授则回顾了北大与史语所的渊源，并提出应当坚持过去史语所重视史料的传统，从史料出发归纳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理论。随后，荣新江教授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的可能性。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关于学术传统、研究范式和学科关系等一系列议题。

第四场主题研讨“西学在中国”的召集人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和英语系高峰枫教授，主题发言人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刘北成教授首先从“西学”概念引发的困惑出发，追溯了学问上中西之分的起源，进而拷问了中西问题的实际意义，并提出自己的学术愿景：“没有隔阂的学术，不以族群的身份划分和命名的学术”。李强教授则给出了一个更具有历史现实色彩的“西学”定义。他认为西学包括他所从事的西方政治学，即中国人看待西方道路、模式等文明核心的方式，并指出了这种认知态度在三个阶段的变迁。此后，与会学者主要就西学的概念、西学研究心态的变迁、西学研究的根本立场、西学如何成为“为己之学”等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在北大文研院的宣传视频中，邓小南院长提到了这样两句话：“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共同努力，砥砺前行”。这两句话或许都是在表达一个真诚的愿望：在当今常为新的时代中，北大文研院将抱定“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探寻学术研究的真正素养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可能性。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北大文研院必当集同道同人，聚同德同心。同时，北大文研院也将坚守学术净土，依托北大综合优势，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集聚骨干学者，深化积累，探索基本原理及前沿领域，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学术支撑，促进海内外学界的深度交流。

（撰稿：谢雨新）





特邀访问教授



## 特邀访问教授

### （一）樊锦诗



樊锦诗，女，1938年生，祖籍浙江杭州。1963年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敦煌研究》期刊主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妇联执委，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长期从事石窟考古、石窟保护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做出了巨大努力，极大地提高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主要学术著作有《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陇上学人文存·樊锦诗卷》、《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等；主编有《敦煌石窟全集》（26卷本）、《解读敦煌》等；发表论文《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隋代石窟的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敦煌学的历史、传承和突破发展》、《为了敦煌久远长存——敦煌石窟保护的探索》、《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莫高窟坚守者保护传承世界遗产的文化自觉与担当》、《永远的敦煌》等百余篇。

### （二）黄进兴



黄进兴，男，1950年10月生，台湾中研院院士、副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1973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75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获硕士学位；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获博士学位。1983—1990年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1990—2008年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2008年当选中研院院士，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2009年起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世思想史、宗教

文化史、史学理论等。代表作有《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从理学到伦理学：清末民初道德意识的转化》、《皇帝、儒生与孔庙》、《儒教的圣域》等。现兼任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亚太地区谘议委员、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两岸学术交流规划委员会委员、台湾大学兼任教授。曾获“国科会”优良学术奖（2次）、“国科会”杰出研究奖（2次）、行政院新闻局优良图书奖、财团法人杰出人才发展基金会“杰出人才讲座”（2次）。

### （三）安德鲁·阿伯特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男，1948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Gustavus F and Ann M. Swift 杰出贡献教授。阿伯特教授在1970年完成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与文学”项目并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于1982年毕业。之后十三年阿伯特教授任教于新泽西州立大学，直至1991年返回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执教。1993—1996年，阿伯特教授任芝加哥大学学院社会科学部长。自1997年以来，阿伯特教授一直担任牛津大学努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的访问院士，并每年定期在该学院进行研究工作。阿伯特教授在1999—2002期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自2000年起担任国际社会学最顶尖的杂志之一——《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主编。他在2002—2003年度担任美国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会会长。2011年，阿伯特教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阿伯特教授此次来北大，系文研院与“大学堂”讲学计划合聘。）

### （四）木山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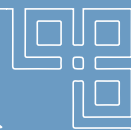


木山英雄，男，1934年生于东京，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5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神奈川大学等。1996年曾出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木山先生的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文学思想论集》和《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谈》和鲁迅的《故事新编》等。





北大文研学术





## （一）北大文研讲座

01

### 樊锦诗： 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向樊锦诗教授授予特邀教授聘书

2016年9月13日晚7点，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一期《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在二体报告厅举行，这次讲座是北大文研讲座系列活动的首场讲座。讲座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教授主讲，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主持。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在260名观众之外，文研院还于隔壁教室设置了直播室，满足了另外120名听众的需求。本次讲座的在线直播吸引到近8000人观看学习。

正式讲座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代表文研院向樊锦诗教授授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的聘书。樊锦诗教授是文研院首位特邀学者，由她来启动“北大文研讲座”系列活动，意义非凡。随后，主持人荣新江教授向观众介绍了樊锦诗教授的人生历程。他表示，樊院长的事迹无需赘言，她1958年入学北大，1963年毕业，之后就

扎根敦煌，从事学术、考古、行政和保护等系列工作，是当之无愧的“敦煌的女儿”。而作为一个北大人，樊锦诗教授的这次讲座之行，就好像敦煌的女儿回了娘家。樊锦诗教授的系列活动已经为北大掀起了一阵“敦煌风”。

在热烈的掌声中，樊锦诗教授开始了讲座。在第一部分中，樊锦诗教授详细介绍了敦煌莫高窟产生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从历史而言，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先民在敦煌活动。在公元前111年，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彻底将现甘肃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并采取移民等措施，确立了敦煌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从地理而言，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之地”，是东西方的中转站，也是知识、宗教和文化的交汇地。此外，印度佛教艺术也对敦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樊教授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涵盖敦煌

莫高窟的创建和主要内容。据公元698年的唐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名叫乐僔的和尚“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次有法良禅师“又于僔师龕侧”开了第二个洞窟，是为“二僧开端”。之后莫高窟连续十个世纪保持佛事活动。至14世纪元代以后，莫高窟停止建造。迄今，莫高窟保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000多身，1900年在藏经洞发现的50000余件文献和艺术品更是价值非凡。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介绍了莫高窟的基本情况之后，樊锦诗教授还详细阐释了莫高窟的石窟建筑形制、彩塑类型和壁画分类。

第三部分中，樊锦诗教授简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主要内容和流

散过程。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即今编第17窟），但由于清末战火频仍，列强劫掠，许多文物没有得到良好保护，而流散到国外。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二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原始情况。

在第四部分，樊锦诗教授以例证的方式介绍了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文物的文化价值。就历史价值而言，莫高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宗教、历史、地理文献，反映了先民的生活状态和经济生活场景。在众多文书和文学作品之外，藏经洞中还包括多种非汉文写本。而从艺术角度入手，敦煌艺术风格的流变和日臻完善也是中国艺术史上丰富的资料。就科技价值而言，敦煌莫高窟记载了众多生产、生活活动，涉及农业、交通、天文学、医学等诸多方面。



樊锦诗教授讲座座无虚席



最后，敦煌莫高窟也是多元文化交汇的典型，樊锦诗教授在这里引用了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经过了一千年的创造和交融，莫高窟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思想、艺术态势。

最后，樊锦诗教授简要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她表示，一次讲座很难充分介绍敦煌莫高窟及藏经洞文物的内容及价值，她希望通过展示的图片证明莫高窟是我国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瑰宝。

或许在学术研究之外，观众们从樊锦诗教授身上感受到的更多是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在讲座开始时，考虑到樊锦诗教授的年龄，主办方为教授准备了沙发，但是樊锦诗教授坚持站在讲台前进行讲座，并且笑着说：“坐着讲没劲儿。”年近八旬的她就这样足足讲了两个小时。在整个讲座过程中，樊锦诗教授也非常注重调动观众们的积极性，不仅选择了丰富的插图和例证，还专门“讲点儿有意思的”：从自

己的上海人身份入手，串联敦煌的经典故事；以婴儿车、刷牙等风趣幽默的壁画图片让观众们感受到更加真实可感的敦煌。观众们也纷纷表示，在听到樊锦诗教授的讲座之后，感觉敦煌文化和与其相关的学术活动并不是冷冰冰的，而是温暖而有趣的。在此之外，樊锦诗教授一直表现出对北京大学的感激和眷恋，讲座的字里行间都是对敦煌的热爱之情，这种丰富而具有持续性的情感体验也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正如荣新江教授总结的那样，樊锦诗教授不仅是北大的骄傲，还在敦煌凝聚了艺术和学术的力量，能够听到这场讲座的人，都是最幸福的人。樊锦诗教授的讲座是“北大文研讲座”的第一讲，这场高水平的讲座为文研讲座系列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研院此后的系列讲座也将保持一贯的水准，力争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领域的学科建设提供一流的学术支持。

（撰稿：谢雨新）

## 02

### 黄进兴： 历史的转向 ——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 历史意识的再兴



台湾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应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于2016年9月14日在人文学苑108报告厅进行题为“历史的转向——20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是黄院士“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讲座的首讲，也是北大文研讲座系列活动之一。讲座由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担任评论人。北大历史学系荣



台湾中研院院士黄进兴

新江教授等众多师生到场聆听。

黄进兴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近期又担任了中研院副院长一职。此次来到北大主讲“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讲座，同时也是黄院士担任中研院副院长后的首次出访，意义非凡。

黄院士首先提出，“当代史学的进行式”是一个内涵广泛的题目，以此为视野有助于思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此次系列讲座包括的两个子题，都是史学可以涵盖的问题，也都牵涉到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本次讲演主要涉及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诸多问题。

欧洲人习称19世纪为“历史的世纪”（age of history）。黄院士认为这代表

了历史的思维在当时代替了神学或哲学，成为主导欧洲学术思想的原则。当时的社会科学普遍流行“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反映了史学对酝酿过程中的社会科学的强大影响，以致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艾克顿（Lord Acton）在19世纪末的讲话中认为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和方法，也是每一门学科都必须应用的方法。而也正是从19世纪末开始，羽翼丰满的新兴社会科学开始质疑进而抨击“历史的方法”。如古典经济学派缪格（Carl Menger）于1989年与代表历史学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关于“历史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有效性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韦伯的时代。



黄院士提出，20世纪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关系逆转变化的分水岭。以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首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积极提倡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讽刺当时的史学大师蒙森（Theodor Mommsen）对史前考古和人类学一无所知。惠灵顿（Johan Huizinga）认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若懂些社会学、人类学，其对希腊文明的理解就会好多的。同时，兰克学派的集大成者伯明翰（Ernst Bernheim）在晚年修订其史学方法论巨著时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承认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法国的年鉴学派则积极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其两位创始人费夫雷（Lucien Febvre）及布洛克（Marc Bloch）均是涂尔干社会学的信徒。种种情况都反映了20世纪社会科学声望日隆，对史学形成压迫的情况。

此时，正值发轫的中国现代史学，在重视社会科学方法一事上与同期欧洲史家如出一辙。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甚至本土史家吕思勉也认为清代章学诚之所以无法达到现代史学的地步，主要是因当时没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在教学制度上，朱希祖首先将社会科学作为北大史学系的必修科。黄院士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他回忆读书时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选一门修习）也被列为必修课，当受北大此项制度影响。

但是，上述标榜“新史学”者似乎都未意识到社会科学与史学的潜在紧张性。社会科学向史学提供方法论与解释框架，

而社会科学家仅希望史学家整理材料，将后者降低到图书馆员的地位。另一方面，此时的社会科学侧重系统的分析，时间因素不受到重视，受其影响的历史分析也出现缺乏历史感等种种问题。

史学与社会科学此种单向的主从关系，随着20世纪中期社会科学危机的到来而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60年代末叶，社会学界开始质疑本门学问的信度，史家对社会科学的片面倚赖遂画上休止符。同时，历史考察的重要性再度受到重视，社会科学开始“重新发现历史”，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历史的转向”。

此种趋势先发于自然科学史领域。孔恩（Thomas S. Kuhn）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冲击了学界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了解。社会学愈发重视历史的向度，将研究展延到前近代社会：如以色列爱森思大（S. E. Eisenstadt）的《帝国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1963）与史可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和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1979）。这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常被视为韦伯的延伸。

在史学领域，一再被贬抑的叙事传统日益开始受到重视，以致出现“叙事回归”（return of the narrative）的口号。这种风气的改变在年鉴学派的第二、第三代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史写作方面，史景迁以优美的叙事打动了美国读者，广

受欢迎。而历史人类学的典范之作——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历史之岛》（Islands of History, 1985）处理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结构与个人无法兼容的难题。在其眼中，结构的变迁是“事件”积累造成的，这不仅洗刷了“事件”的污名，也奠定了“叙事”在理论范畴中的地位。

黄院士同时强调，“历史的转向”不是回归19世纪的“历史主义”，它同时要求对以往史学进行一连串“反思”。如国家、民族、社会以至时间、空间、时序等种种概念均由特定时空情境造成。如布迪厄所说，历史学家用“当今通行的词语去阐述历史现象，而这些词汇在当时或者尚未出现或者另有他意”。在当代研究中，如安德森对民族国家客观性的质疑，及沈松桥、王明珂对黄帝神话的结构，都是对史家习用概念考镜源流的佳例。黄进兴院士最后提及尼采的名言，强调历史学家不会具有凌空环顾的能力，在深入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对“视野”进行反思应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彭刚教授的点评就黄院士的论题——20世纪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恩怨情仇”展开。彭教授提出，20世纪初是鲁滨逊“新史学”的起点，此时历史学面对着自然科学的压力。“新史学”的宗旨是要求历史学不再固步自封，而这一进程的深度和顺利程度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二战之后出现了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即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此时的史学居于“产品链”的低端，一方面将整理好的史料作为原材料供给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则是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消费者。这种情

况直到20世纪末才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塔尤》被认为是引导“叙事的转向”的重要著作，它的作者勒华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的领军人物，原本提倡使用计算机对史料进行量化统计，其研究机构不称“工作坊”（workshop）而称“实验室”（lab），并声称“历史学家不作为计算机程序员，他就一无所是。”从勒华拉杜里治学理路的转变亦可看出20世纪末期人文研究风气的变化。

彭刚教授进而将话题转到年鉴学派：认为其特征是讲究分析、结构、问题导向而非事件的史学。他们认为传统史学“叙述”的策略是一种历史哲学——即认为个人偶然性的时间最终造成历史。布洛克和布罗代尔关注的则是时间过程中的人类。彭教授最后指出了布罗代尔三个时间层次论述的问题：政治事件的时间、经济的时间、地理的时间，每下面一层决定上面一层，而上层无法对下层产生影响。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地理的、环境的、经济的因素无法完全决定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因素。而单纯的生态、人口要素变化无法形成具体的历史印象，由此造成一种缺乏历史感的史学，无法满足人对于过去人类如何生活的关切和好奇。这也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的研究取径产生“从地窖到阁楼”变化的原因。

（撰稿：胡斌）



## 03

## 安德鲁·阿伯特： 作为理念的学术和作为 日常工作的学术



特邀访问教授安德鲁·阿伯特发表主题演讲

2016年9月20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之后，文研院特别邀请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阿伯特教授回顾了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及跨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核心建制（学部制、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委员会等），并从学术研究和教学这两项核心使命出发，深度检讨了上述独具芝大特色的体制的创设背景及发展得失。树立深刻的学术理想，坚持育才，珍惜那些认同大学理想的核心师资，在阿伯特教授看来是芝大社会科学长盛的关键。阿伯特教授的演讲为北大文研院乃至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镜鉴。

以下内容为阿伯特教授演讲摘译：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建立类似文研院的机构，很可能是因为学者们担心，如果只是和自己学科中的同道打交道，思想会慢慢变得狭窄。这个担心或多或少体现了我们对学术工作的两种认识，从时间的

角度看，两种认识一长一短。学术工作会有深远的影响和成就，而最“长期”的影响莫过于它拥有一种深入学者心中的观念力量。与此同时，学术工作也是一个很“短期”的工作，最短的工作，莫过于它在学者手中每日每时的劳作形态，也就是学术工作的日常形态。

新的学术机构的建立，正如学派的诞生一样，实则和学术的长短方面都息息相关——在学人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所体现的学术工作，以及在观念中呈现的学术工作。对于后者，我们有很多关于学术群体和学术组织的制度分析和历史叙述，但对于前者，我们却着墨不多。在文研院成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轴上去想象它，但我们要理解的是，学术工作的长与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我要和在座学者们分享的第一个看法是，所谓的日常工作，影响却是长远的（long-run matters）。

我还是从我自己最熟悉的学术环境——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院系——

来向各位同行们阐释我理解的“长”与“短”的学术工作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自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成立以来，芝大的社会科学可以说相当稳定地维持了出色的研究水准。这种稳定性在其他伟大的美国大学的社会科学中并不常见，坦率地说在芝大的其他学科中（比如芝大的英语文学研究，音乐学研究等等）也不常见。这种稳定性是从何而来的呢？

### 跨院系分工的社科楼，使芝大学者的日常工作无法回避跨学科

芝大在学术结构上的第一个创举是他的学部制度（divisional form）。芝加哥大学是第一个将所谓的“艺术与科学”师资（Art and Science faculty）分别并入不同学部的大学。这个决定来自于芝大历史上最传奇的校长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他在成为芝大第五任校长时，只有29岁）。1929年秋天，芝大在成立社会科学学部的同时，建起了社会科学研究楼（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社会学系、历史系和经济系今天还在那里。

将不同的社会科学院系放在一个社科楼里面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考虑是，大学希望不同的院系彼此多多了解，虽然当时的专业化并不深。我们要知道，最初这个楼分配办公室的时候，并不是以系为单位进行的。为了这次讲座，我特意从芝大的历史档案里面调出了从1930年至今的办公室分配记录，我还没有完整地掌握这80多年的分布，不过有些初步发现。早在1930年，这座楼

里面没有哪一层楼有超过一半的办公室是仅被某一个院系的教师占据的。比如，当时成立仅一年的人类学系就在二楼，五位人类学家、三位经济学家、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社会工作教授在一起。如果说楼层的分配出于学术上的考虑需要集中的话，那大概是以研究方法来安排的，比如1930年代是统计学上的Neyman-Pearsonian突破时代，所以在四楼的经济学家和做定量工作的菲尔丁·奥格本（Feilding Ogburn，中国社会学家陈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的导师），以及定量政治学者哈罗德·格斯纳尔（Harold Gosnell）应该有很多共同语言。五楼的格局与此相反，芝大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史学者约翰·内夫（John Nef，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助手，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始者之一）和通史学者哥特沙克（Gottschalk），以及芝大经济学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者弗兰卡·奈特（Frank Knight）都在那里。1930年，就在这座高五层的楼里诞生了四本重要的学术期刊，这四本期刊至今都是所在领域最重要的期刊：《美国社会学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现代史杂志》和《社会服务评论》。

### 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成为推动芝大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引擎

芝大的本科生核心课从1930年至今名字变更了几次，但是基本的设置不变：这些基础课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它们设置的前提不是专业学术教育的需要，来自各院系的



教师来讲课，辅之以小型的讨论班。这个核心课程里面的社会科学序列包括三门课，除了经济学系，所有的社会科学系通常会有3至4名常年在核心课序列中任教的教师。自1960年起，本科生院不再独立设师资之后，学部对核心课教学的意义尤为重要。到1990年代我本人担任本科社科部长（这是一个负责学部和本科生院沟通的职务，接受本科生院长和学部部长的双重领导）的时候，毫无疑问，芝大的社科核心课程仍然保持了通识教育的色彩，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以阅读经典著作作为内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弗洛伊德、卢梭、黑格尔等等。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许多社科学者的努力下，芝大创建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课程”体系（civilization course）——最初还包括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课程。显而易见，这些核心课在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永恒的人类文明的核心问题不断地在芝大社科学者的思考中出现。

我要补充的是，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建设文明课程的动力确实让芝大的学术研究视野扩展到了狭义的西方之外。1960年算得上是这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以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全球史研究专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世界史及伊斯兰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奥斯曼土耳其研究专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非裔美国史学家）和何炳棣先生为代表的若干学者推动芝大历史系成为一个致力于世界历史，而不是美国史研

究的大系。核心课和文明课体系成为推动芝大跨学科研究的两个引擎。

### 成功的机构设置把学者们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上

从社科楼在芝大历史中的历程，我想做如下的总结：在最“短”的学术工作，也就是日常的工作中，社科楼的跨学科设置拥有巨大的成功，因为它给了学者最基本的研究的兴奋。在比日常工作稍长的时间尺度上，社科楼见证了如思想委员会这样的独一无二的芝大产物的早期辉煌，这种辉煌是在思想委员会作为所有社科学者的精神家园时取得的。在更长时段上，也就是芝加哥学派成长的尺度上，我认为这些学派会因为跨学科的联系而茁壮，但它们只会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思想流派而留存。

从芝大的核心课的历史中，我的观点如下，毫无疑问，核心课作为教育项目是巨大的成功，也无疑给学者带来了学术上的激励。人类学和区域研究学者从核心课程中收获巨大。芝大人人类学的课程体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本科核心课的继续。但从核心课教育中获得最大学术动力的或许不是最执着于核心课教育的学者，而是那些在博士生阶段就加入本科生教学的年轻学者。是这些未来的学者用核心课的教育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将芝大的教育传统带到了其他大学，传到了下一代的学者当中。长期来看，核心课与专业性的知识生产的张力是很明显的。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都是从那些最不热衷于核心课教育的学者手中产生的。

从只培养研究生的跨学科研究委员会的历史来看，以思想委员会为例，它们培育了新的学者，比如那些能用多种学科方法，但仍专注于特定文本和问题的学者。在日常工作层面，社会思想委员会总是充满了生机，在那里读书的博士生尤其如此。但是在更长的两个时间维度上，思想委员会并没有这种长期的活力。它对经典文本阅读的强调在哈耶克时代结束之后，再不具备那么大的影响。从最长远的角度看，思想委员会没有成为新的芝加哥学派，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毕业生很难在与芝大同级别的大学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从芝加哥学派的例子上，我们看到，自1930年代起，经济学和社会学学派并

不缺乏典型的学术领袖，他们是些能将重要的学术成就和非凡的指导学生成长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好学者。更重要的是，学派的成功一定建立在不间断地思考与人类文明有关的大问题的基础上，社会学和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那些对学者的日常工作有明显影响的设置，比如社科楼在芝大的作用，它如何影响一个学科去培养那些能够将学者和导师的素质合而为一的学术领袖。所有取得了成功的芝加哥学派，都源于它所拥有的伟大的理想，以及能够培养出执着于这些理想的年轻学者们。

（本文系田耕根据阿伯特教授讲稿整理）

## 04

### 李零： 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



2016年9月20日下午，作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发表了一场题为《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自“西周的邻居与后院”讲起》的演讲。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唐晓峰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发表演讲

博学院的徐天进教授应邀担任讲座评议。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

李零教授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艺术史、军事史、方术史、思想史、历史地理等方面，主要著有：《入山与出塞》、《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我们的经典》（四册）、《我们的中国》（四册）。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近年来，李零教授在学术研究上，致力于对古典文献作出融会贯通的全新解读，并且结合中国各地最新考古发现，从各种文化遗迹和出土文物中，重新梳理早期中国的历史。他的新书《我们的中国》就是近十余年来从学术论著、田野考察、思想随笔之中凝结出来的思想火花。本次演讲，李零教授在简单介绍此前历年研究心得之外，重点为大家带来了他在近几个月暑期田野实践中的最新研究与发现，并提出了“西周的四合院”这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在李零教授看来，从历史地理角度，以西周为中心，东南西北几个被辐射的地区可以视作西周的“前庭后院”，它们之间相互交流，人才往来，贵族通婚，形成了紧密的文化中心，为中国两次最重要的“大一统”——西周大一统和秦汉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要想更深入地认识、理解“我们的中国”，就必须从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宏观层面着眼，思考“大一统”的形成、探究周秦的崛起。

演讲甫一开始，李零教授表示，“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是个非常大的话题，这次他将选择从一个非常具体的角度入手。李零教授首先谈到了《禹贡》一书，孔子时代留给我们的三部经典《诗》《书》《易》，其中《尚书》当中的《虞夏书》在治书上颇有见解，提出天文要看《尧典》，地理要看《禹贡》。《禹贡》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禹贡九州”的范围很大，为中国早期历史奠定了大致的范围，而这其中又有两个地方，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是夏商板块的冀州，另一个就是在冀州之西、周秦崛起的雍州。众所周知，周、秦向东发展，奠定了我们中国版图的基础，那么，周秦又是怎么从今日陕西的西部崛起，又是如何向东方发展的呢？这就是李零教授本次讲座选择的切入点。

我们今天所说的“封建”，最早是指西周的“分封建国”，而西周的封建，其实是一次民族大迁徙。李零教授指出，西周的大迁徙情况十分复杂，这其中可以总结概括为六种情况：

第一种，灭其国而占之，封建同姓，仍用旧名。如周灭密须（媯姓），封媯姓密须，现今的灵台就有很多西周铜器墓；灭丰镐，立宗周，仍称丰京、镐京；灭黎，封媯姓之黎（塔坡墓地）；灭殷（鄣），封康叔封于殷都朝歌，仍称卫（包括邶、鄘、卫）；灭邢，建邢侯于原地（南小汪邢都遗址和葛庄邢侯墓地）；灭燕（北燕，媯姓），迁其民为南燕，仍称北燕（琉璃河遗址）。管叔、霍叔的封地也是沿用商代旧名。周迁汉水流域的曾于西土，封媯

姓之曾于随枣走廊（叶家山墓地和枣阳的曾国墓地），也是换姓不换氏。巴子也是媯姓之封。

第二种，灭其国而迁其民，所迁之民仍用故国旧名。如鄂（媯姓）本在北方，后迁随枣走廊（羊子山墓地）和南阳盆地（夏响铺墓地），一直称鄂。

第三种，灭其国而迁其民，换用新名。如周灭商奄（嬴姓），迁其民于晋、陕、甘三省，建赵、梁、秦。

第四种，周人从西土东迁，仍用西土旧名。如虞、芮、虢（平路的虞国古城遗址、芮城的芮国古城遗址和梁带村墓地、三门峡的南虢上阳城和北虢下阳城遗址）。蔡、郑也是西土旧名。吴是从虞中分出。申、吕是西土姜姓国，与周联姻。西周初年封吕氏于齐、许，西周晚期封申、吕皆西土旧名。

第五种，寻访古国遗迹，为之立国。如封神农之后（姜姓）于焦，黄帝之后（媯姓）于蓟，尧之后（祁姓）于黎，舜之后（妘姓）于陈，禹之后（姒姓）于杞，汤之后（子姓）于宋，各有新名。

第六种，国名随封地改变而改变。如卫初封于康，后封于卫；晋初封于唐，后封于晋。

经过这一系列复杂的迁徙、换姓和分封建国，这些地区相继崛起，李零教授将之比喻为一个“四合院”。东面西安、咸阳一带，如同凸起的“院子”，就是西周；而在西周的北面，现今宁夏固原到平凉、泾川、庆阳，就是西周的“厢房”；西周西面的宝鸡地区，则是它真正的“后院”；宝鸡地区南面，西周的另一个“厢房”，

就是汉中地区，是通往四川的门户，和巴蜀有很密切的联系。周秦的崛起，就是在这个“四合院”中完成的。

在这个“四合院”中，最重要的当属西周的“后院”。“后院”以陇山为界又分为东西两侧。其中陇山西侧、泾水上游的地区，分别居住着不同的戎族。在陇山西侧，礼县有骆赢和緄戎，前者是西土嬴姓的大宗，最近著名的秦国考古发现就诞生在这里；后者是陆浑戎，也叫獫狁或犬戎。天水有绵诸戎和獫狁戎，清水有邽戎，甘谷有冀戎。李零教授猜测，秦安、张家川估计也属于邽戎和冀戎的势力范围。临洮有翟戎，在泾水上游，固原有乌氏戎，镇原有彭戏戎，庆阳有义渠戎。“因为《半月传》，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义渠戎’了。现在庆阳县也成立了各种研究义渠戎的研究中心。”李零教授提及暑期的田野考察，幽默地提及自己最新的发现。

泾水上游的戎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戎族可以顺流而下，沿泾水一直打到咸阳和西安。《诗经》中对这样的戎人来袭，也有很多记载。同样，无论是周人还是秦人，要想突破咸阳和西安的口子，向西面挺进，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在这个“四合院”中，“后院”的北面和西面，是特别重要的地区。

在东面的“后院”，即陇山以东的宝鸡地区，也可以以汧水为界，再分为东西两区。李零教授推测，汧水以西，很可能是虞国。古时汧渭之会的陈仓城，可能在今戴家湾一带；西山墓地，可能在今纸坊头一带；吴阳上下畴（畴，音质，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可能在宝鸡市



西北的吴山庙附近；汧水以东，很可能是虢国；古时平阳城，可能在今虢镇东、西高泉、太公庙一带；密畤，可能在今钓鱼台一带；雍山的血池遗址，可能也就是汉北畤。接下来考古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寻找并确定这些重要的古代地标。

住在这个“四合院”中的其他“邻居”，都是什么人呢？李零教授从中国古代的姓氏、文字的角度，继续解释“西周的邻居”。族姓制度是周人的发明，商代是没有的。姓的来源是因生赐姓、以别婚姻。和周通婚、往来密切的国族大多有姓，但当时也并未完全覆盖，有些国族仍然以氏为姓，不加女旁。

围绕这些“邻居”，形成了目前中国相关领域考古的最新成果和未来方向。“邻居”之一，东迁的三国虞、芮、虢，其中“虞”在古时亦作“吴”，因此，很可能虞国与吴山有关。而现在国家博物馆的重器“虢季子白盘”，就出土在虢镇，很可能是城虢的所在地。目前中国的考古成果，很多都是这三国东迁之后的发现，而它们的西土旧国还缺乏系统的考古材料。

从姓氏和文字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发现，古籍中经常提及的文王贤臣，除了太公姜姓，辛甲姒姓，尹佚姒姓，其他都是姬姓，与文王相互之间都有亲属关系。

除了君臣，重要的关系还有夫妻。周王十二后，至少一半都是姜姓。“邻居”之二，申、吕两地，都是姜戎所在之地。西土的申地在什么地方，仍然是现在的考古谜题。但是西周金文的“申”与“陈(陳)”

存在文字学关系；“東”乃“申”的另一种写法。因此，李零教授提出，陈仓、陈宝的“陈”，或许与“申”有关，秦文公的陈仓城也许就在申国附近。陈仓也就是“陈地之仓”，地处汧渭之会，附近有仓储，有利于漕运。汧渭之会的孙家南头有秦国墓地和西汉仓储遗址，即是旁证。

周、秦与西戎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周的“邻居”之三，就是氏羌和獫狁。姜姓之戎为氏羌，允姓之戎为獫狁。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很多分支，周、秦文化从何而来，历来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学者讨论先周文化，有高领袋足鬲与联裆鬲之争。很多学者认为，高领袋足鬲是姜戎文化的标志，联裆鬲是姬周文化的标志，但具体到某一遗址，何为主，何为从，分歧很大。李零教授认为，考古文化多为复合文化，而非单一文化，任何一个地点，居民的成分都很复杂：既有当地土著，也有外来征服者，还有征服者从外面迁置的移民。他们互相通婚，父族母族各一半，至少有两种文化的成分。比如秦文化，既有直肢葬的铜器墓，也有屈肢葬的陶器墓，很难说哪一种算标准的秦墓。戎人的遗存也同样如此，并不能严格地区分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

西周的“邻居”之四，密须、阮、共地区，其中姒姓的密须多和姬姓的周相互通婚。“邻居”之五的骆赢、秦赢，分属陇山西东，骆赢在陇山西侧，秦赢是从骆赢中分出，居于东侧。骆赢与申国通婚，秦赢与周通婚，申周也相互通婚，形成了混杂的文化。如果将秦国各个君主的居住地、墓葬地、祠畤地列成一张表格，就能

清楚地看到秦国势力范围的变迁。

“邻居”之六的缙、“邻居”之七的巴蜀，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变迁、姓氏的改变，来推演还原当时的历史地理状态，再结合已经出土的各种考古文物，能够更好地还原早期中国的文化、政治状况，从而为下一步的考古带来启发。

李零教授将讲述“中国”的命题还原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西周大一统，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将以西周为中心形成的各种文化和政治族群比喻为西周的“四合院”，前庭后院之中，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雏

形。李零教授在演讲之中，自由穿梭于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之中，让不同来源的材料相互印证、相互推演，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座的最后，评议人唐晓峰教授特别点评道，“饶宗颐先生曾说，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西周最为重要，而李零教授则用自己的研究向人们证明了西周为何重要。正是从这些看似琐碎的偏旁部首、姓氏婚姻、文物器皿之中，我们才得以勾连出中国古老的渊源，还原早期中国的模样，讲述当代中国的历史。”

(撰稿：薛静)

## 05

### 夫马进： 巴县档案中所见的中国清代乡村社会的“自治”

2016年9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第五期在理科五号楼社会学系201室举行。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夫马进作了题为“巴县档案中所见的中国清代乡村社会的自治——以乡村裁判为中心”的报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担任主持。

夫马进教授首先从对内藤湖南中国社会论的反思入手，来理解清代的巴县社会。他认为，内藤氏并非建立在史料

基础上的理论，而是基于一种“国家—社会二元论”，将“乡团自治”理解为新国家成立的可能基础。这种论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泛地流行于世界各地，例如马克斯·韦伯也存在类似的对于中国历史二元论的解释。他们的理论多是出自明恩溥(Arthur Smith)与罗伯特·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等人在清末民初时出版的中国旅行记、见闻录、实地调查等书。现在，通过“巴县档案”这样根植于地方的第一手史料，

我们能够突破内藤湖南所论述的“国家—社会二元论”的观点。

“巴县档案”中所见的乡村社会的“自治”问题，有一些不是在巴县衙门，而是在乡村社会中所进行的“裁判”。所谓“乡村社会”并不是村落，而是施坚雅（Skinner）所说的最基层的中心地，即“基层集镇”（Standard Market Town）。夫马进教授关注于乡村社会中的诉讼，并以“巴县档案”中所见的“健讼棍徒”何辉山一人为中心进行讨论。何辉山并非正式的朝廷官员，但是也像官僚一样“顶戴水晶，手持朝珠，着补服”，表明了他具有五品官员的品级，这正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渗透到社会基层的一种方式。何辉山所统辖的“地方团练”，即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自发组成的自卫组织，向巴县衙门申请开设太平场这个农村基层市场。知县与“地方团练”之间的矛盾与交涉，体现在“巴县档案”中何辉山与知县之间围绕“团规”的修订所形成的材料中。通过这些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国家与当地居民之间围绕着“自治”问题的理解有着极大的不同。“地方团练”希望能够得到处理基层社会中的诉讼的权力，他们在团规中写入“嗣后无论户婚、田土、债项等事，必先凭团族理剖，有不息者，任其（听本人）据实控告”，换言之，如果居民出现有关户婚、田土、债项之类的民事案件，都可不直接到县衙门诉讼，而是经过团练与宗族的“理剖”。而知县则对此进行修改，竭力不将“自治”权授予“地方团练”。

夫马进教授进一步解释道：所谓“凭团理剖”的含义是“依靠团邻，并根据道理来判断黑白曲直”，这种表达在“巴县档案”中大量出现。此前的研究一般将其作为“调解”来理解，或者是为了给知县带来一个好印象的套话，即在到衙门诉讼之前，已经做了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纠纷的努力。但是在很多案例中，“凭团理剖”意味着某种裁判式的调解。夫马进教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凭团理剖”在乡村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其与衙门的裁判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尽管团练希望争取到“凭团理剖”的权力，但是官府对此是绝对限制的。从重庆府巴县太平场的团练以及对于团规的修订行为来看，当时的乡团，甚至连现在所谓民事裁判的权限都没有。实际情况绝不是如内藤湖南所说的“官吏不介入自治的范围，而是仅仅在文书上执行其职能”。相反，即使在最基层的集镇上，也能看到国家力量的渗透。

夫马进教授 1948 年出生于日本爱知县，1987 年起任教于日本京都大学，1996 年荣升为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攻的讲座教授。1997 年出版《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被授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同年该书获得日本学术界的最高奖项——“恩赐赏·日本学士院赏”。

（撰稿：熊昕童）

## 06

### 坂元弘子： 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 & 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之后的省思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坂元弘子

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日本一桥大学中国思想史教授坂元弘子先生于 10 月 13 日和 18 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会议室主讲两场北大文研讲座。坂元弘子教授本科师从西顺藏教授，后进入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及博士；曾在 1981 年至 1983 年以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高级进修生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由楼宇烈教授指导；1998 年起担任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科教授，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家。坂元教授多年来一直关注从民族、阶层阶级与性别视角分析中国思想的近代转型，日文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人种·身体·性别》）、《連鎖する中国近代の“知”》（《连锁的中国近代之“知”》）等，不仅是日本学界的典范著述，也得到中国学人的高度肯定。坂元教授在两场讲座中展现了挖掘材料的独特眼光、研究初期全球化的清晰思路以及对近代以来性别议题的

特别关注，同时也为大家介绍了自己治中国思想史三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新书《中国近代の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10 月 13 日下午的第一场讲座以“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念”为主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主持。夏老师提醒大家注意坂元教授在演讲主题之外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她左翼知识分子的气质；其二是她论述背后近代思想史的学术脉络。

坂元教授从晚清女性的缠足与反缠足谈起，注意到中国以西欧为榜样开启的女性主义论述，实则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人种论、社会进化论的色彩。关于缠足女性的论述也被当时流行的画报以石印版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进入民国，受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解放女性论的影响，优生思想替代了富国强种，成为女性论述背后强有力的资源。此时隆兴的漫画杂志中大量出现男性画家创造的女性形象，他们对时髦女性的想象，焦点从小脚女性或妓女转



而变为“摩登女郎”。

坂元教授以1928年创办的《上海漫画》和1934年出现的《时代漫画》为对象，具体分析摩登女郎如何逐步演变，特别是在30年代新生活运动和中日战争逐渐扩大的时代背景下，摩登女郎原本清新、活泼、新潮大胆的性解放形象逐渐被颓废色彩的社会讽刺所取代。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受害的女性成为《救亡漫画》、《抗战漫画》等一系列刊物的核心，摩登女郎及其背后的大众文化被民族救亡观念驱逐，如《抗战漫画》第七期的封面画描绘的被日军残杀的中国母亲。

坂元教授特别展示了女性画家梁白波的作品，她在30年代《立报》上连载《蜜蜂》，刻画了充满摩登感和反抗意识的蜜蜂小姐；战时，梁白波参加了叶浅予、张乐平等组织的救亡漫画宣传队，笔下独特的女性也为战争所中断，但又呈现出与男性画家浓郁的民族主义不同的社会性别思考，如漫画《跑出厨房、走出闺房，去负杀敌重任》等。

最后，她介绍了1950年代《漫画》月刊中的男女形象，男性表现为“战斗英雄”、“劳动英雄”，而女性则只有在“生产模范”形象中才能出场。坂元教授提示研究者们不要忽略性别与战争、革命的关系，大众文化的视觉材料能扩展历史文化研究的视野。从性别问题入手考察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从漫画材料进入议题，使她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更为深入。

在提问环节，坂元教授又就新文化运动中优生观念的盲点、绘画传统中女性形象的变化、明清才媛群体的认识等问题做

了精彩回答。在回答漫画与文本作为材料的不同意义时，她再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研究理路，引入图像的角度能帮助研究者发现文本材料产生的盲区，从而更贴合近现代大众文化领域的性别议题。

10月18日下午，坂元弘子教授带来第二场演讲，“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岩波新书）之后的省思”，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主持。讲座开始前，王老师介绍了坂元教授的学术背景，并提到从早年研读庄子、禅宗的思想到进入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坂元教授治思想史既有注释性研究的扎实，又有多元视角的广阔。在第一场讲座中，坂元教授展示了自己对漫画、图像材料与性别问题的最新成果；第二场讲座，她借谈新书的章节，概括了自己三十年来不断完善的思想史研究。在问题意识上，她谈到两个关键，一是克服“一国史观”，一是克服单性史观，主要关心初期全球化到当代全球化的过程，谈民族、阶级、性别问题与媒介的发展过程，这也是这本《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区别于以往研究之处。

坂元教授先回忆了自己求学和研究的历程，谈到另一本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旧作《连锁的中国近代之“知”》。在20年前写就此书时，她已大致形成对中国近现代思想问题的看法，并贯穿到近作中。前近代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中西融合，儒家在不断融汇、调和的过程中，调整社会公平性并构成新的秩序。新书的第一部分“清末与早期全球化”就以“前近代思想史俯瞰”开篇，除了以纵向的时间线索串联近代思想

变化的各个时期之外，坂元教授更关注作为潜流的性别、人种、教育、传播媒体等问题，例如讨论太平天国是否是妇女解放的起点、黄种与1903年日本人类馆事件、女性放足与精神病等等。第二部分为“中华民国与新文化的潮流”，时间上跨越整个民国时期，在材料和事件的选取上，坂元教授在每一章都设置专节讨论当时浮现的新的社会性别问题，将思想史的流播与更具体的女性问题结合起来。新书的第三部分为“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话题一直延续到“南巡讲话”与超高速经济发展。

在完成了一部讲述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思想、历史著作后，坂元老师分享了三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她著述中的重要经验。首先是以梁启超为中心所形成的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网络之持久性；其次是刘师培、何震、章太炎、梁漱溟及乡村运动等批评立宪政治的潜流；最后是东西文化调和论或东西文化论争的双重变奏之持久性。这三点或可视作大历史叙述之下有待后学发挥的潜在线索。

坂元教授在书后的反思中提到清末民国知识分子的苦痛，她认为，触摸到近代核心问题的一批知识分子很可能早已超越了当时的中国现实，而他们的讨论因此也具备了超越性，在观察当代中国问题时依然有效。

演讲结束后，几位特邀嘉宾做了精彩的回应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老师提到新书的框架虽以思想史为主线，但坂元教授贯彻了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某些以往不太突出的问题照亮，极具启发性。近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

种思想流派构建各自心中的中国问题，后世研究者选取怎样的标准评价，是应然还是实然，是理想还是现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张志强老师则向坂元教授请教从政治思想史转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学术理路变化背后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涓教授由坂元教授的新书谈到学术思想脉络与日本研究界的语境。在怎样看待晚清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殊位置时，日本学界因其自身的问题而发掘出不同于五四立场的另一种思考路向，这种突破贯穿在坂元教授的新书之中，展现出她的独到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春凌老师谈到中国思想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不同之处，而坂元教授的著述重新从儒、释、道进入近代，打通近代，尤以她对近代宗教思想的重视，使得近代思想史不再作为政治史的附庸，而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这也是新书非常重要的突破之处。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袁一丹副教授注意到坂元教授新书的多重线索，既是连锁亦是复调，考验着主要线索的吸附能力。

坂元教授在随后的总结回答环节，谈到自己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后所面临的种种时代问题。她由传统中国哲学转为偏向文化史、社会性别的研究，源于在游学过程中受到的西方社会学的影响。写作一部通史，让她更清楚地观察到，现代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早已在清末浮现，这实在是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撰稿：周晏）



## 07

## 约恩·吕森： 历史之思 ——面向未来的视角



德国史学理论家教授约恩·吕森

10月25日，德国当代知名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了题为“Historical Thinking - A Vision for the Future”（历史之思——面向未来的视角）的讲座，文研院首批驻访学者之一、德国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系助理研究员曹晋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健教授等近三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吕森教授1938年生于德国杜伊斯堡，是当今国际史学理论界、历史教育界以及历史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波鸿大学、比勒菲尔大学、埃森高等人文学科研究所长期进行教学研究工作，他也为建立德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维滕/海德克大学（Witten/Herdecke University）做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多部著作和论文被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受邀在世界

各地访问讲学，中国包括台湾的史学界对他的史学理论和历史思想十分关注，他的中译代表作有《历史思考的新途径》。

吕森教授认为，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不仅仅是大学里一门课程，也不仅仅是图书馆里的一类书；历史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个面对自己历史的文化。他的研究出发点之一是德国社会在二战之后如何看待对犹太人的屠杀，以及这些看法如何影响了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吕森教授对这些在德国尤为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和细致的研究，这使他在德国乃至世界上得到了公众的关注和学界的尊重。此次在文研院的讲座，是他近年来对于历史哲学的最新思考。

首先，吕森教授以一中一西两个例子开始，阐述了历史在人类生活中的功能：一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亨

利王与华列克的一段对话，二是清代乾嘉时名幕汪辉祖对历史的认识。吕森认为，历史是在变化中作为导向的时间概念。实现这一“导向”的方式有四种：遵循传统、以史为鉴、变化可被视为改善世界的良机以及变化可以是全新的开始。

接着，吕森教授分析了自18世纪末至现代，人们对历史的观念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即经历了“加速”、拓宽知识的范围、世俗化以及专业化。历史是时间化了的人性，是人类的时间维度，历史就是人类的“γνώσι σαυτὸν, recognize yourself”（认识你自己）。在今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类作为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的框架已由最初的思辨观念成为了现实，从而可以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认识历史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

那么，历史在当下面临着哪些挑战？吕森教授认为，挑战在于五个方面，即全球化、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于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的拒绝以及“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和“创伤”（trauma）的经历对意义造成的破坏。

面对上述挑战，目前已出现了若干“有问题的应对”，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创伤”论等，吕森教授对这些应对一一作了批判。他首先否定了各种“后XX主义”的魅惑，并指出，从“实质的历史哲学”到“形式的历史哲学”转变中，历史却不见了；在“创伤”记忆话语分析中，真实的过去消失于记忆之中，即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

批判过后，吕森教授提出他的解决之道——构想一种新的历史哲学。他认为，现在在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存在着三种互相排斥的历史哲学：它们是“实质的历史哲学”、“形式的历史哲学”和“功能的历史哲学”，而三者应该得到“中和”（intermediated）和“综合”（synthesized）。具体的作法有三：首先是要重塑“实质的历史哲学”，这就需要人类学的基础，运用人类生活中时间变化的人类学理论——康德的“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其次，要将“形式的历史哲学”概念化为意义形成的进化论；第三，历史记忆或文化记忆应该获得“历史文化”理论（Geschichtskultur）的形式，从而可以被理解为或重塑为“功能的历史哲学”。这一新的历史哲学结合了另外两者，即功能综合了内容和形式。

最后，吕森教授展望了历史思考的全新范畴和基本策略。他指出，首要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接受和对待过去某些事件的创伤性。他给出的答案是：将“非人性”（inhumantiy）纳入历史变革的人类学基础；将“无意义”纳入历史意义的判据；在思考过去及其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意义时，在“人之施为”（human agency）的内外，别忘记考虑“人之受难”（human suffering）。

（撰稿：曹晋）



## 08

## 李弘祺： 善书、道德反省与宗教伦理 ——近世中西方法的异同

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10月30日下午2点，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在静园二院会议室进行题为“善书、道德反省与宗教伦理：近世中西方法的异同”的讲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与近30名师生参与了讨论。

李弘祺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教育史及思想史，主要学术著作有《学以为自己：传统中国的教育》、《东亚的教育与科举》等。

李弘祺教授指出，在中国，传统宗教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非常有限，长期支配着人们生活的是儒家的道德哲学。宋元以后，儒家恢复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儒释之间的交流也提升到更系统的层次。大致在明中叶，中国的思想逐渐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功过格、劝善簿、善恶簿的大量出现便是一个缩影。

以表格的形式记录下来一个人每天的功与过，并给予每一件事情一个中肯的评价。如此一来，人们就可以对于自己每天是否做到明辨是非有个大致的概念。这样的表格通常称作“善恶簿”，在英文中也常被翻译为记录优缺点的簿子，即“功过格”（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李教授援引了丰富的史料（如海瑞、吴廷翰、东林学派的例子），向听众展示了明代善恶簿的景象。

李弘祺教授指出，在西方，大约相同或略晚的时候，传统基督教受到来自启蒙运动科学及理性的挑战，人们开始摸索新的道德思想的基础。富兰克林所列举的十三种美德便与天主教的传统七美德明显不同，他同样以功过格的形式，每日对自己的德行进行反省并做出记录。这反映了18世纪的学术氛围，在一个知识人日渐世俗化的世界，人们很难在其中为伦理道德找到可靠的根源。

随后李弘祺教授又将视角拉回到中国，认为魏晋玄学的讨论中也体现出了宗教色彩，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开始于13世纪并且持续到了18世纪。在李教授看来，整个明代其实也是一个受宗教影响很大的时代。日益普及的“三教合一”理念给大众的生活和信仰带来了丰富性和多样性，人们相信儒释道三教之间基本的道德观念，对于精神生活信仰的重视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在15到18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强烈的宗教情操，而这种情操导致了同样强烈的对于完善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特别是对于学者来说，每天在日记中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李弘祺

记录下自己做得好或不好的行为，并且在此基础上用表格进行整理和反思，已经变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课。这种每日记录与自我反省的善恶簿也为一部分普通人学习使用，形成一定的风气。李教授认为，广泛使用诸如善恶簿、劝善簿式样的图表，既增强了人们对于完美道德生活的期许，也使得思想在高度专制的晚明时期得到了暂时的释放。

在18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上帝逐渐从大众信仰中退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哲学家所讨论的道德，出现了一种道德感哲学。这在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均有体现。相似的道德感哲学在中国思想中也有出现，比如孟子的“恻隐之心”、王阳明的“良知”等。李教授还特别提到一本西方流传颇广的善书：《治家经济》（The Economy of Human Life），它与当时中国的善书非

常相似。此外，在17世纪以后的西方学校教育中，也出现了记录学生平日表现及操行的功过格，这同样体现了对个人道德完善的关注。

李弘祺教授进一步指出，几乎同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仅仅是偶然，但两者可能都反映了思想转型时期一种主流的社会焦虑。在中国，这种焦虑体现在从偏理智导向的朱子理学思潮到一种更加重视直觉或者说是带有原始宗教探索性的神秘主义思潮（心学）的过渡过程。在稍晚的欧洲，德育正从宗教的根基中被切割，由此他们也开始展开对新的道德基础的探寻。表面看来，两种知识情境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是两者都在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重叠了，那就是两者都在严格地面对宗教，甚至宗教性。

因而，不同于中外比较历史研究中通常着眼双方之“异”，李弘祺教授则从道

德思想层面切入，将 13 到 18 世纪的中国与 15 到 18 世纪的欧洲进行跨时段的历史比较，通过结合各自的背景和援引丰富的史料，从中发现双方“异”中之“同”：作为德育的一部分，宗教性同时在中西方受到关注。这也将启发人们关于道德生活之基础的深入思考。“功过格”这一道德技术的出现意味着古典的德性修养转变为外显的规范要求。

在互动环节，李弘祺教授对于宗教与

宗教性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宗教是一种实践或制度，而宗教性则关乎生命的来源与去向，涉及到如何摆布自己的生活等问题。邓小南教授指出，在宋代官员考核中已出现了“功过分数”，这一官方的实践性做法与明代民间出现的“功过格”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撰稿：杨箐）

## 09

### 王笛： 被遗忘的调查报告

#### ——《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后面的故事

10 月 31 日下午 2 点，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之邀，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教授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作了题为“被遗忘的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的故事”的讲座。讲座由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杜丽红副研究员等近三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王笛教授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学系，后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师从中国城市史专家罗威廉教授，后长期在美任教，现为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

系主任。讲座开始前王奇生教授介绍道，王笛教授早在出国前就已经凭借《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一书在学界名声在外。后来在美国写作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 - 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两书更是奠定了其在学界的地位，而这次王笛教授的讲座主题便是围绕他新近写成的专著。

王笛教授一开场便谈到这本新书与北大颇有渊源。该书的主体材料便是北大图书馆独家收藏的一份名为《一个农村社团家庭》的调查报告。这份两万多字的调

查报告是 1945 年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沈宝媛写成，内容涉及成都郊区“望镇”一位当地袍哥的副舵把子雷明远（人地名均为化名）个人、家庭及其基层权力结构。王教授认为此资料的独特之处是把秘密社会家庭做为调查对象，为我们了解袍哥这一秘密社会提供了极宝贵的微观视角。而王笛教授的新书便以调查报告中 1939 年雷明远亲手枪杀女儿这一事件入手，以该报告为基本史料，兼及其他各类材料，来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川西秘密社会、地方权力组织结构等面向。

王笛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先驱者的自我定位，是以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为目标。燕京大学早期社会学教授都是以农村调查作为他们的学术的兴趣点和着眼点。从这点看，沈宝媛有关秘密社会的调查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燕大社会学本身的定位和实践有关。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内迁成都，也直接在空间上促成了这一调查的进行。虽然该调查作为一篇论文，因作者综合分析能力有限，或许不能算非常成功，但是其中所记录的资料却是非常珍贵，原汁原味。王笛教授直言，他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翻遍了东亚图书馆几个书架的文史资料，也没有能与沈氏的报告相媲美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沈宝媛的调查，我们后世的研究者不可能如此深入地进入到一个袍哥的家庭中，进而揭示出秘密社会对基层地方秩序的控制。

随后，王笛教授简要介绍了沈宝媛身世与教育经历。沈宝媛的父亲沈祖荣是中国早期图书馆学开拓者。沈宝媛进入燕大学习后，逐渐受左翼思潮和共产党影响。燕大迁入成都后，沈宝媛加入了 1942 年成立的燕大海燕剧团。1945 年 9 月 29 日，沈宝媛还参加了有 248 名左翼文化人士签名《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要求国民党政权立即结束一党专政，保证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毕业后，沈氏至香港，曾任青年会劳工干事。1950 年后就再未出现在公开报章文字中。直到近年沈宝媛以她父亲、兄长之名在中山大学设立奖学金，才重现音讯。

王笛教授之后用大量老地图、方志、日记、书信，甚至文学作品等多种类型的材料，仔细缜密地考证了“望镇”的位置，最后得出“望镇”即现今成都郊区的崇义桥，展现了极强的史学考证工夫。

最后，王笛教授认为他的这本新书其实写了三个人，一是雷明远、一是沈宝媛、另一位是他自己。他强调各种材料（包括沈宝媛社会学调查）只提供了一种视角而已，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各种视角、立场、面向完整地展现出来。可以说，这本书三人用三种不同的叙事，讲述了这个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撰稿：姜涛）





## (二) 未名学者讲座

### 01

#### 易平： 自由的海洋，还是封闭的海洋？ ——古典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洋秩序



评议环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平（右）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左）交流

2016年9月27日晚，“未名学者讲座”首场讲座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正式开讲。“未名学者讲座”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业全球基金资助，讲座由北大校内青年学者主讲，鼓励大家围绕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基础和交叉问题进行观点发表与研讨。“未名学者讲座”第一讲题为《自由的海洋，还是封闭的海洋？——古典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洋秩序》，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易平副教授主讲，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评议。

讲座开幕之前，文研院邓小南院长首先发言。邓院长介绍道，北大讲座众多，但“未名讲座”有其特定宗旨，顾名思义，该讲座更加关注北大校内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以促进文科基础学科的发展和青年

学者的进步为宗旨。资助方代表、兴业全球基金副总经理杨卫东先生介绍了兴业全球基金对高等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并以“投资与研究都是孤独的修行”勉励大家。随后，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为主讲人易平副教授颁发“未名学者讲座”的聘书。

讲演中，易平副教授先对所有权/领有权(dominium)与统治权(imperium)两个重要法律概念进行厘清，前者是排他性占有，而后者更多涉及使用和管辖范

畴。罗马人将地中海视为“我们的海”(nostrum mare)，因而罗马法将海洋规定为万民共有物(res communes omnium)，也即不可被排他性领有，以此也圈定了帝国崩溃后各政治主体对海洋问题的论域。发展至中世纪，伴随罗马法复兴运动，意大利城市国家开始对沿岸海洋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不同的领有权或统治权主张。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后，各君主国家的霸权竞争使得有关国际海洋法的争端越发凸显。起先是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教皇敕令下名义上瓜分全球航海贸易，紧接着就是17世纪荷兰和英国对海上霸权的争夺，由此也开启了格劳秀斯和塞尔登之间关于海洋自由抑或封闭的争论，这争论也持续百年之久，奠定了近现代海洋法的基本概念与规范。

易平指出，格劳秀斯在1609年出版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中论证海洋不可被占有，并对海域作出区分，坚持领有权和统治权在概念上的分离，反对从陆地领有权到海域领有权的类推，秉承海洋自由论为荷兰这个海上马车夫与英葡间的全球贸易竞争张目。紧随其后，1635年，塞尔登《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出版，与《海洋自由论》针锋相对，塞尔登认为统治权以领有权为前提，陆地领有权可以类推到海域领有权，因而英国对其海域享有排他性的绝对主权，但进一步塞尔登也不区分海域，这为英国主权海域的无限扩张留有余地。

此后，德意志的普芬道夫、荷兰宾刻舒克、瑞士瓦特尔等法学家都加入关于海洋自由或封闭的论争中，推动了国际海洋

法基本概念和规范的形成。这场论证最终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思想资源，诸如领海和公海、自由与封闭的区分，非领域性的管辖权，陆地与海洋的二元视角，以及国际公益和国家利益的平衡。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就“海洋的自由与封闭”做了进一步延伸，提出三个应更多关注的问题：首先，对国际法的历史观察，不应只重视西欧霸权在知识领域与权力领域的普遍性与规范性建构，还应重点关注海洋帝国和内陆帝国这两种政治秩序间的遭遇，海洋法与内陆帝国如何在政治、法律或知识领域展开竞争，最终取代后者的政治秩序成为一套国际普遍秩序；其次，如果用帝国和后帝国时代的视野代替由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视野，那么我们发现处于后帝国时代的国家在封闭海洋和自由海洋间的徘徊，正是谋求民族国家全权占有和通过帝国想象谋求普遍秩序的矛盾；第三，不仅应该研究海洋法的规范性秩序，也应考察规范性秩序的发生学——不同政治主体或者行动者，诸如海盗或商团，如何在互动竞争中形成这套规范秩序。

“未名学者讲座”为系列讲座，计划于本学期内，每周由一位北大青年学者主讲，邀请相关领域的资深学者点评。该系列讲座将成为文研院常规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撰稿：林斯澄)



## 02

## 叶少勇： 万法皆空 ——佛教哲学中“空观” 的起源与沿革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

10月11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未名学者系列讲座”第二期。此次讲座主题为“万法皆空——佛教哲学中‘空观’的起源与沿革”，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梵巴语教研室叶少勇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王颂教授评议。

叶少勇老师首先以“空”的选择题引出本场讨论的主题——“空观”。对于大家通常认为的佛教中“空”的含义，他给出两个选项：

A 空 = 完全不存在 / 毫无所有

B 空 = 无常：只有运动变化，没有恒常实体。

叶少勇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曾出现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但与通常人们所熟悉的“无常”相反，原本的“空观”就是指A，即“不存在”，而人们熟悉的B观点是公元四五世纪后才出现的新思想，而后上升为主流观点。

为了厘清“空观”的起源与沿革脉络，叶老师选取了印度佛教史上六个关键节点，

依据其代表文献对各时期空观作简要梳理。

节点	时期	代表文献	代表观点
1. 原始佛教	公元前5世纪	《尼迦耶》 《阿含经》	“人无我”
2. 部派佛教之说一切有部	公元前后	《大毗婆沙论》	“人空法有”
3. 初期大乘佛教	公元前后	《般若经》	“人法俱空”
4. 初期中观	二三世纪	龙树《中论颂》	“空即是中”
5. 瑜伽行派	四五世纪	《瑜伽师地论》	“言说法空，离言法不空”
6. 思想转折	4-6世纪		“缘起性空”

叶少勇老师认为，此前佛教的“空”虽然空掉的对象和范围不同，但“空”这个词都是彻底的不存在的意思，他们对“空”的讨论也都遵循“若有，则常；若无常，则无”的原则，而我们现在常听到的“缘起有，自性空”、“空是无常，不是无有”等说法，是4世纪以后才在印度出现的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主流。

在部派时期，为了统合佛陀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说法，就提出了二谛的概念，即世俗谛和胜义谛（也称第一义谛），认为佛有时顺俗谛说法，有时顺胜义谛说法。到了早期的中观文献中，世俗谛被认为是颠倒见，胜义谛是如实见，主张以如实见来对治颠倒见。

但不迟于4世纪，印度就出现了将中道与二谛结合的思潮，叶老师从《大智度论》和《成实论》中找到相关的论述，认为这两部著作都与部派佛教有关联。这里的中道跨在二谛之间，世俗谛上是有，所以不落空的极端，胜义谛上是空，所以不落有的极端。这样的二谛已不再是如实见和颠倒见的区分，而被解释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换言之，世俗谛也是真理，不能被轻易否定，否则就无法支撑中道。

二谛的双重原则，违背了此前佛教各派一直贯彻的“若无自性则无”的原则，主张无常、无自性的事物也可以是有。这样，事物的有被安立在世俗谛的标准上，无自性的空就安立在胜义谛上。从世俗上讲缘起生灭是有，从胜义上讲一切皆空，空不碍有，有不碍空，二谛圆融。

这样的理论与龙树的中道观不同。龙树的中道是建立在毫无妥协折衷的彻底的空的基础上。因此，在龙树身后的三百年间，给龙树的《中论颂》做注释的几位中观大家，都是将中道建立在胜义谛上，抵

制这种跨二谛而立中道的理论。直到6世纪的清辨，才将这种思想引入中观，成为大乘佛教思想的拐点，稍晚的中观论师月称，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批判清辨的主张，但在依二谛而立“缘起性空”以及反对离言自性的问题上，都继承了清辨的观点。

龙树的空观较难处理善恶因果问题，瑜伽行派是在可知现象之外另立了一套离言的真实因果运作机制，可以说是“胜义因果”或“真实因果”，这样就可以保持对世俗妄见的批判力度。而清辨则正好相反，建立的是“世俗因果”，是将世俗谛合理化，将因果业报体系建立其上。这样，虽然一切法空，却不能不顾后果，因为，一切法只是在胜义上空，在世俗上还是有的。这一思想体系，经后人的经典译传和消化吸收，成为汉、藏两系大乘佛教的主流。于是，谈空则必诉诸二谛，必说“缘起性空”。

随后，王颂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撰稿：杨祖荣）

## 03

## 程苏东： 拾遗补艺，整齐百家 ——《史记》的文本重写 及其文学性



2016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未名学者系列讲座”第三期。此次讲座主题为“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程苏东讲师主讲，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何晋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评议。

程苏东老师以后人对《史记》的二元性评价为切入点，引出本场讨论的主题——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史记》中的“文本失控”现象。“文本失控”是程苏东老师在研究《汉书·五行志》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文本的编钞者在整合多元文本来源，或尝试将某种意识形态植入既有文本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真正弥合异质性文本的内在张力，文本常呈现出割裂、突兀、重复、矛盾等多种失序现象”，传统的研究大多从辨伪学、校勘学、史源学层面展开，而在文学批评的传统视域中。这类文本一方面缺少所谓文学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自身又存在种种错谬、失序之处，因此历来为文学评点、研究者弃而不顾。但是程老师却认为，正是这些失控的文本向我们展现了编钞者试图构建有序文本的过程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成为我们深入文本深层结构、了解编钞者文本编纂意图的有效途径，也为我们对这一类型的文本展开文学批评提供了绝佳的视角。

接着，程老师就通过对《史记》中“失控的文本”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处理这些史料时的困境与挣扎。程老师将这些个案分为四类：一，史实记载前后重复；二，史实记载存在内在逻辑矛盾；三，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四，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导致叙述脱节。

程老师所举的第一类的典型案例是《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舜的家世记载：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



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程苏东

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

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显然，第一节和第三节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重合度，舜父、母、弟“欲杀舜”的核心论题，以及舜杀之则不可得的应对方式，完全一致地出现在两节文字中，显然这并不符合文本叙事的一般体例。程老师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乃是因为司马迁想把关于舜的两类经典性故事做一个统一整合的结果：即以《尚书·尧典》为代表的“道德型”故事和以《孟子·万章》为代表的“智慧型”故事。所以为了塑造舜“孝而不愚”的形象，司马迁特意增加了“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这一细节，而这一细节却并不见于现存的任何先秦典籍中。从叙事学的层面来看，“更娶”这一细节完美地解释了舜的父母及其兄弟何以待舜

如此恶劣的原因，并使其父“常欲杀舜”这一骇人听闻、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释——从白雪公主到灰姑娘，“继母毒子”可以说是各民族传说中最常见的母题了。而这样看来，留存于《史记》中的这两节叙述虽然功能基本相同，但在属性却存在根本差异：第一节是更加“合理”的叙述方式，而第三节则是更加“权威”的叙述方式——“瞽叟更娶”虽然使得舜所在家庭的恶劣环境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一说法本身却缺乏可信的出处，至少在关于舜一生行藏的几种权威文本：《尚书》、《孟子》、《五帝德》、《帝系》中，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说法。很显然，从《史记》的叙事逻辑看来，这样两节文字的并存绝非司马迁有意为之，而是他最终定稿时删汰未尽所导致的“文本失控”，但这一“失控”本身却帮助我们还原了司马迁在这段文本的编纂过程中一度面临的“选择恐惧症”：一个合理的叙述，与一个可靠的叙述，究竟应该选择哪个版本呢？从两节文本都由道德型与智慧型两种文本缀合而成可知，这两个版本都是司马迁精心撰写的，但在文本的“合理”与“权威”之间，他举棋不定，难以取舍，最终将这一选择永远留到了今天。

第二类“内在逻辑矛盾”的典型案例出现在《鲁周公世家》中。如庄公三十二年（BC662）公子斑鞭犇事，程老师认为从司马迁的叙述来看，公子斑悦梁氏女而“往观”之，而其圉人既知公子斑此行目的，犹自墙外与梁氏女戏，则公子斑本人所处究竟为墙内墙外，便值得考虑。若其在墙内，则此圉人公然与公子争偶，何其

大胆！而斑之鞭犇，不可谓重。若斑亦在墙外，则圉人之戏梁氏女，实恐为斑戏之也，若此则斑怒而鞭犇，更可见其无赖嘴脸。总之，此节故事极具戏剧性，然司马迁于此叙述含混不清，无论是作为史家还是“小说家”，都是不完满的叙述。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呢？通过与上源文献《左传》对比，程老师认为此处失误极有可能是司马迁误读了《左传》原文，将“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一句读作“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又以“说”释“讲”，从而衍生出一段男女情事。而这里司马迁误读的原因，恐怕是他对于“女公子”这一说法并不熟悉所致。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刻意要如此塑造公子斑的形象，而是无心错误所致，故由此产生的文本也属于“失控的文本”。

第三类“文辞突兀、失实或冗余”，程老师以《卫康叔世家》中关于卫宣十八年宣公杀伋子之事为例进行了详细解说。《史记》中的这段故事采自于《左传·桓公十六年》，通读《左传》上下文，可知“宣姜”就是伋子的未婚妻——齐女，而有趣的是，司马迁在叙述中将“宣姜”改称为“宣公正夫人”，从“宣姜”从夫溢看来，这一解释并无错讹，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其前文皆以“齐女”称呼宣姜，且在叙述中并未言及以齐女为“正夫人”之事，则此处径以“宣公正夫人”为辞，隐其母姓，反令读者疑惑此“宣公正夫人”与齐女是否仍为一人。因此，从叙事学的层面来看，这一改笔不得不说是造成了行文的突兀。

第四类“同一史事前后褒贬不一，

导致叙述脱节”。这一类，程老师举的案例是《宋微子世家》中宣公、穆公让国一事。从“天下通义也”、“和亦三让而受之”这些司马迁构拟的言辞、细节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宣公让国背后的大义凛然，而在这段叙述之后，司马迁特意抄录了《左传》所载“君子”之辞，明确对宣公让国之大义表示赞赏。行文至此，虽然部分叙述也许没有史料依据，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有趣的是，在全篇最后的“太史公曰”部分，当司马迁再次提及宣公让国一事时，却完全换了一幅面孔，指出“《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认为宣公让国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是造成宋国诸公子之乱的祸端。这里的《春秋》系指《春秋公羊传》，在这一问题上与传文所据《左传》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司马迁当然可以在文本中同时引述两种不同的立场，但从叙事学上说，不应当是这种前后完全脱节、没有任何转折或承接修辞的生硬拼接。熟悉《史记》与《左传》之间文本关系的读者固然知道司马迁所谓“君子”系指《左传》中的“君子”，但对于不了解这一背景的读者来说，仅凭《史记》自身的叙述，我们既无法理解“太史公曰”中对于宋宣公的批评是处于何种原因，也无法理解何以被司马迁称为“君子”的史论者却作出了一个似乎并不高明的肤浅判断。这种前后异辞造成的文本脱节也出现在同篇对宋襄公形象的塑造上。

在分析完以上四类“文本失控”的事

例之后，程老师又为我们总结了司马迁处理多元史料四种基本方式：改笔、留白、补笔、缀合。正是通过这几种方式，司马迁成功地驾驭了多元的史料来源，其生成文本的异质性已经最大可能地被抹平。程老师认为，如果没有高超的文学才能，这种整合工作是难以实现的，而我们讨论《史记》的“文学性”成就，自然不应忽略其整合异质性文本的细致用心和丰富手法。但可惜的是，对于《史记》文本层面存在的“失控”现象，以及司马迁通过改笔、留白、补笔、缀合等方式控制文本的书写方式，文学研究者却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选择性失语”的应对方式，研究者们大多只关注那些叙述流畅、行文谨严的“优秀篇章”，而对于存在疏漏、错置、重复、矛盾、脱节的篇章则不予置评；同时，他们显然更关注司马迁“独立创作”的那些文本而认为其译写、杂纂而成的“依赖性文本”在文学性上无甚价值，不必深究。程老师认为，这种研究立场是值得反思的，为此，他提出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思考：一，尽力还原《史记》的最初书写过程；二，对先秦文献生成进行类型学研究；三，在方法论层面拓展古代文学微观研究的新范式。至此，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随后，陆扬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撰稿：孙玲玲）

## 04

### 郝煜： 雍正朝火耗归公 与国家能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郝煜（右）发表演讲并接受现场提问

10月26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了“未名学者系列讲座”第四期。此次讲座主题为“雍正朝火耗归公与国家能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郝煜助理教授主讲（基于郝煜和经济学院本科生刘正钺的合作论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评议。

郝煜以国家能力的两个方面：壮大“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和绑缚“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为切入点，简要阐述了这两者理论上的因果联系，进而引入本次讲座的主题内容——晚期中华帝国的国家能力问题，为什么中华帝制晚期有两副看似矛盾的面孔并存——“轻徭薄赋”和“横征暴敛”，改革如何壮大了帮助之手，并限制了攫取之手。首先，郝煜简要地介绍了他的主要研究发现。他限定本次讨论的时间范围是1710—1760年，不包括清初和晚清两个阶段。所谓的火耗归公改革即承认附加税的合法地位，

把附加税固定在10%左右，并明确其归属和用途。在介绍完相关文献之后，郝煜详细介绍了火耗归公的历史背景、改革过程和改革绩效。

他首先从清朝督抚的陋规讲起。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清代巡抚的年俸工银是155两，但巡抚每年的开支在20000两以上，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只能借助陋规解决问题。陋规的主要来源是节礼、漕规、关规、盐规、钱粮平头银等。根据康熙默契的正式财政体系，地方财政支出遵行奏销制度，即需要向中央户部进行报备和审批，同时地方正式税收的80%收归户部，而留存地方部分15%还用于地方军备、军需、驿站、衙门开支、慈善事业等，能供地方官员自由支配的财政税收相当。在清朝“一人政府”的地方体系中，州县官有负责税收、司法、社会稳定、吏员衙役雇佣等责任。有道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纵使清廉的官员在附加税和陋规上也会有的一笔可观的收入。而附加税的征收既有公开的加派，



也有隐蔽的加派。总之，在改革之前，清帝国面临的情况是：地方财政留存不足，正式财政受制于奏销制度，缺乏灵活性；非正式制度可以满足地方开支需要且相对灵活，但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不能遏制腐败。故而，帝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集权与分权、监督与激励之间找到最优折衷。

郝煜指出，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对这一问题已经有所认识，但此时改革受限于其组织基础对各级官僚的控制力的缺乏，毕竟各级地方官员既是改革中唯一的受损者，也是改革在基层的实际执行者。而雍正利用密折制度聚拢一批股肱之臣，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清查亏空等改革多管齐下，以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其中，所谓火耗归公改革（1723—1736）主要是承认附加税的合法地位，正式钱粮之火耗外的附加税一律非法，将附加税固定在10—20%，并明确其归属和用途。火耗归公改革具有增加财政收入、均贫富和反腐之作用。改革有三个再分配结果：1、纳税人负担减轻；2、中央政府收入没有改变；3、省政府实现财政收入留存。雍正和朝臣曾就这一改革有过激烈的争论，包括火耗的正当性及其利弊之处。特别地，火耗率应该允许差异和调整，同时不受到户部控制。那么，这一改革的实施是否受到预期成效，郝煜主要从粮食仓储系统和官方赈灾两个方面考虑财政能力与公共品的提供情况。

鉴此，郝煜利用1710—176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库，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效应进行实证结果分析。模型中以每年各省

的免税—赈灾频率为被解释变量，将火耗归公在某省是否已经推行设为哑变量，进而设置哑变量与灾害等级的交互项，同时考虑每年的灾害等级、进士人数、高管人数、省固定效应和督抚的固定效应。针对实证中以各省的赈灾活动为被解释变量，郝煜老师认为这一做法有以下几方面好处：1、赈灾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2、这一时期的赈灾活动有相关数据记录；3、赈灾是一个较“干净”的变量，相较于免税、河工、海防、慈善组织、民变和冲突等对象的考察，赈灾与研究问题更为吻合。

随后，郝煜提出了自己的问题：1、改革是否有效？在不同灾害情况下绩效有何不同？2、改革通过什么渠道起作用？其他政策是否产生类似效果？3、改革效应对时间变化如何？其效应何时不可再持续？进而，他提出两个假设——减负效应和财政能力效应。根据对府均赈灾次数的基准设定，所谓减负效应即正常天气下，改革后比改革前赈灾频率高出多少，而财政能力效应即灾害天气下，改革后比改革前，相对于正常空气，赈灾频率高出多少。回归结果显示，财政能力效应为正，减负效应为负。相较于改革前，正常年份的府均赈灾次数降低0.606次；在灾害年份中，改革后省份较于平常要多赈灾0.742次。至于火耗提解程度的效应，部分提解变量的系数显著，而完全提解变量系数则不显著。当交互项换成改革强度（intensity）变量时，结果与之前类似，不过估计系数变大，即改革强度增加后赈灾次数会随着增加。

紧接着，他进一步探讨了改革效应的动态。分析结果证明改革效应确实是逐渐显现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弱，直至最后不显著。当考虑不同的天气类型和改革类型（即是否完全提解）时，回归结果显示，严重涝灾、普通涝灾和非常干旱的情况下系数显著，而一般干旱的情况下系数不显著，洪涝灾害发生当年的赈灾强度要高于发生旱灾的年份；完全改革中两种效应都要显著大于部分改革的效应。郝煜认为这可能是改革效应随着改革程度的不断加深而提高。对于存在反向因果问题的可能，回归结果否定了受灾较多的省份先改革的可能，即否定了反向因果的存在。此外，郝煜还考虑了省级官员固定效应和高层政治影响导致的遗漏变量偏差，回归结果在控制这些变量之后仍然稳健。

为进一步增强结论可信度，郝煜利用摊丁入亩政策进行安慰剂检验。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两项政策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因此极为适合作为安慰剂检验。对于这一检验结果，他引用了刘丛的研究成果佐证，说明减负效应小且不显著，但财政能力效应依然显著，且与火耗归公的效应结果类似。

谨慎起见，郝煜也指出了实证当中几个暂时难于克服的问题：1、正常年份赈灾次数的减少并不一定归结为百姓负担的减轻，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有更多的钱和粮食，使得民众可以通过常平仓来增强应对灾害的能力，但这并没有减负效应，而是财政能力效应在发挥作用；2、灾害年份中赈灾次数确实在增加，但它是通过赈灾渠道还是通过常平仓解决问题，这不得

而知；3、火耗归公增强了省的财政能力，但却牺牲了州县和基层组织的财政能力，这可能会提高遇到灾害时的报灾概率和赈灾概率；4、整个论述并未说明政府主导的赈灾活动质量会高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5、研究中不讨论为什么雍正没有通过征收间接税来提高财政能力。

最后，郝煜还检验了改革效应消失的转折点，结果表明1741年之前财政能力效应是显著的，之后则变得不显著。以上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之前提出的减负效应和财政能力效应的假设，且结果稳健性较强，但1740年之后改革效果就消失了。相应的历史背景是，自乾隆即位后，中央财政的攫取之手开始伸向省政府的火耗盈余，改革成果开始发生松动。乾隆四年开火耗跨省转移的先例；乾隆五年建立火耗的奏销制度；乾隆四十年开始用捐养廉钱，进而财政自主权在慢慢被吞噬。更重要的是，乾隆年间在通胀背景下并未调整火耗税率。总之，火耗归公改革最终失败。

针对全部分析，郝煜认为，火耗归公失败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对于中央政府汲取地方资源的倾向缺乏制度性约束，地方财政自主权缺乏制度保护，最终随着中央向上聚拢，又回到非正式财政。这可能是诠释黄宗羲定位的一个新角度。

随后，周飞舟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撰稿：沈博）



## 05

## 孙飞宇： 西斯廷的圣母与多拉的神隐 ——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研究

2016年10月31日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了“无名学者讲座”第五期。此次讲座主题为“西斯廷的圣母与多拉的神隐——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评议。

孙飞宇老师首先从介绍弗洛伊德多拉的案例入手，讲述了多拉案例的背景、故事结构以及对于精神分析实践至关重要的对于两个梦境的描述和补充，引出多拉与拉斐尔著名画作《西斯廷圣母》之间的关系。其后，结合了“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背景剖析研究传统之中的多拉，以及多拉案例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之中最隐秘的紧张状态。在此基础之上，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对性、理性、文明的基本结构以及理解社会学之内涵等核心问题进行了讨论。

孙老师认为，对多拉案例进行社会学解读仍然首先要从弗洛伊德本人的工作和案例的具体内容入手。1900年，女病人“多拉”在他父亲的陪同下出现在弗洛

伊德的诊室中，弗洛伊德对她进行了诊断，认为其是“一位普通的癔症患者”——她患有神经性咳嗽、失声、呼吸障碍、偏头疼，并表现出了抑郁及自杀倾向。10月到12月三个月的治疗结束后，弗洛伊德发表了第一份手稿，题目是“梦与歇斯底里”。而1901年4月1日，多拉再次出现在弗洛伊德的面前，并给他带来了新的消息。此后，多拉消失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中。1905年，弗洛伊德分两期发表了多拉的案例。

首先，多拉身处的家庭圈子是理解多拉的一个切入点：多拉的父亲是家庭中统治者的形象，是一个“年近五十、才华横溢且精力充沛的企业主”，而她的母亲则被弗洛伊德描述成一个“愚蠢、未受过教育且有严重洁癖的家庭妇女”。多拉的哥哥大多拉一岁半，是她和整个家庭的“典范”，但在家庭争端中则会与多拉站在不同的立场——哥哥站在母亲一边而多拉站在父亲一边。她还有一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身体都不健康，多拉的姑姑是她的偶像，但最后死于急剧恶化的消瘦症。而多拉本人从六岁开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左）发表演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右）对讲座进行评议

体弱多病，在情感和生活上极为脆弱地依恋父亲而鄙视母亲，并由于长期治疗无效而极为抵制医生。在长期的患病、抑郁以及近期的昏厥与自杀留言后，被父亲强行带到弗洛伊德的诊所。

根据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官能症是两大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一是力比多的执着导致的倾向，二是成人偶然的创伤性经验。而多拉的父亲向弗洛伊德叙述了这一创伤性经验，后文称为“湖畔事件”——多拉父亲由于患病而需要长期在欧洲南部的一个小镇上疗养，疗养期间，多拉一家与当地的另外一个家庭即“K夫妇”一家发展出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关系”：K太太和多拉父亲之间、K先生和多拉之间都发展出了十分亲密的关系。但有一次，多拉告诉父亲，在一次她与K先生单独的湖畔散步中，K先生突然非常突兀地向她求了婚。在震惊之下，多拉说她打了K先生一耳光并转身离去。多拉的父亲和叔叔立刻去找K先生求证此事，

但K先生对此矢口否认。在向弗洛伊德总结了这些背景之后，多拉的父亲恳求弗洛伊德帮助他们一家，使得多拉“回到正常的轨迹”。

接下来，孙老师介绍了促使官能症发生的第二项因素——力比多执着导致的倾向所包括的两个因素，即“幼儿期的性经验”（史前经验）和个人的“性体质”。这使得我们必须去关注弗洛伊德对多拉早期经验所进行的解读和分析，而这种分析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围绕多拉形成的复杂的多重结构。首先，是多拉、多拉父亲和多拉母亲构成的俄狄浦斯三角结构，多拉在这一个三角结构中成为母亲，一个被背叛的角色；其次，是多拉、K先生和K太太形成的三角结构，多拉在此代人为K太太，而与K先生形成亲和力结构：弗洛伊德发现，很多细节证明多拉对K先生也有着爱恋之情，她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被求爱的形象；再次，是多拉与K太太之间的关系，K太太既是她的“情敌”，



同时也是她的“爱人”，这是多重性倒错的最后一环。在此，弗洛伊德引出了儿童心理学中“儿童性欲”的概念——在多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儿童期状态，即多重的性倒错：无类别、种族、亲属界限和道德感，不会产生任何厌恶的感觉。至此，孙老师为我们梳理出了这个案例中以多拉为轴心的基本结构。多拉认为自己是被父亲作为礼物交换给了K先生，以作为K先生将K太太作为礼物给他父亲的一个回礼。在所有的结构里面，多拉要么被背叛，要么被拒绝。而她生活世界的所有关系，都在她的癔症中以极其具身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此后，弗洛伊德运用了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即“自由联想法”，令多拉对他讲述并补充了自己的两个梦境。多拉讲述的第一个梦在弗洛伊德看来基本上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梦——多拉通过这个梦取代了她的母亲。多拉的第二个梦意象更为复杂，弗洛伊德对这个梦中的意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认为梦境的第一重含义是“蹂躏处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多拉对于梦的补充，这将我们最终引到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通过自由联想法，多拉补充道，梦中她“拒绝陌生人而独自前往”这一行为意象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现实——几年前，当她在德累斯顿停留期间，她在当地的一位表哥提议做她的向导带领她游览著名的历代大师画廊，但是当时多拉“拒绝”了，她“独自前往”历代大师画廊并在拉斐尔的名画《西斯廷圣母》前静静伫立了两个小时，全神贯注于默默的崇拜之中。

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她无法回答，最后只说了一句“圣母玛利亚”。

孙老师围绕着“圣母玛利亚”这一意象，梳理了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传统如神话学、宗教学传统之内的讨论。多拉在“湖畔事件”发生的九个月后，腿部出现行动不便，虽然多拉自己声称是阑尾炎手术导致的后遗症，但弗洛伊德认为“九个月”以及“失足”（腿部行动不变）是鲜明的生殖意象：如果当初多拉接受了K先生，那么九个月后多拉很可能会生下一个孩子。而西斯廷圣母与多拉之间的重合关系，就在于关于圣母的最基本意象即是未婚怀孕或“神圣始胎”的问题。孙老师进一步将这种关联放在“世纪末的维也纳”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并揭开了多拉这位“永远的病人”的真实面貌。

身为犹太人的多拉身上背负着犹太人自身的宿命：永恒的不安和被驱逐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脆弱。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和资本主义而来的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为大众文化、剩余价值以及私人的休闲生活提供了可能。在智识的层面上，启蒙运动的主体观、康德意义上的“个人自治”以及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尔、涂尔干、韦伯、惠特曼等等所谓的“现代性意象”开始出现，女性也开始进入到公共领域。与此同时，对应着各种各样的颓废、退化、忧郁、边缘、无意义以及各种各样的病症的出现。另外，心理学领域出现了对于“癔症”的认识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将癔症视为一种基于欧洲传统、欧洲文明与现代文明产生冲突而迸发出来的一种时代现象。

对于长期遭受电击治疗而不见成效的多拉而言，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和可能。事实证明，弗洛伊德确实治好了多拉的病。

那么，“多拉”这一名字究竟来自何处？它的背后有何含义？它与《西斯廷圣母》之间又存在什么隐秘的关联？

孙老师借用潘诺夫斯基（Panofsky）等人的考证，认为从希腊以降，多拉其实就是“潘多拉”的意思，基本意象是一个“礼物”。而潘多拉在欧洲文明史和神话学中，“夏娃”和“圣母玛利亚”在意象上都存在着重叠。未婚生子和神圣始胎，可以理解为一个从没有规则到产生并受制于规则的状态，作为一个造物，她（潘多拉、夏娃、圣母）创生了秩序，即作为第一个女人而繁衍后代；但同时她本身即是秩序的创生，而对于她来说最痛苦的地方恰恰在于这种“被造性”。而多拉在圣母像前的神隐便意味着认同圣母，而寻找一种脱离交换的家庭繁殖经济秩序的出路，因为“神圣始胎”恰恰是欧洲文明史传统中能够超越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以及弗洛伊德等关于人之为人的基本结构的一种神圣性状态。圣母代表着永恒的、纯洁的、无法被刺穿的女性，是超越于世俗时间秩序之外的。相比之下，耶稣则是一个卷入到弗洛伊德式父亲牺牲性献祭的家庭经济学中的儿子，他作为历史的一环，坐在父亲的位置上，被刺穿、钉立、牺牲，最后倒在母亲的怀里。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便是一个“弑父”的结构，儿子最终坐到了父亲的位置上，但是一定要付出代价。

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构成了欧洲文明史最为隐秘的一个结构，与此并存另外一个结构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结构——意识倒在无意识的黑暗大陆、无意识的大陆承担理性历史——正如圣母怀抱伤痕累累的耶稣基督那般。

顺着这个思路，孙老师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式的提问，提出了一个社会学式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提出一个在马克思、弗洛伊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前提下没有破坏和占有的爱的经济？这是现代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提问，在弗洛伊德那里，家庭也被看作是文明最核心的结构，是神圣政治的机制。但是，这种提问无论从现实上还是意蕴上都超出了弗洛伊德的掌控，我们或许可以从多拉在圣母像面前的神隐、对于神圣始胎的认同开始将讨论继续下去。最后，孙老师强调，弗洛伊德对性的理解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殖意涵，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态，是一个类似于尼采的“意志”的概念，这种理解也会帮助社会学人去反思作为文明代表的家庭问题、反思文明的本质问题，反思理解社会学究竟应当怎样去面对行动的意义的问题。至此，此次讲座圆满结束。

随后，渠敬东教授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评议。

（撰稿：牟思浩）



### （三）北大文研论坛

01

#### 樊锦诗： 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教授

2016年9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期“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座谈会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此次座谈会是樊锦诗教授北大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一项，并邀请到彭金章、荣新江、杭侃、孙庆伟多位著名学者围绕敦煌学的发展、敦煌遗址的保护、樊教授与敦煌研究院在敦煌保护研究工作中起到的作用等话题积极展开了讨论。

会上，首先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教授作题为“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的主题演讲。樊教授首先指出，敦煌莫高窟本身的价值、诸多前辈们为敦煌事业的打下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各类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推动等因素，均是敦煌保护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得到长足发展的重要背景。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担负敦煌石窟

保护、研究和管理职能的综合性研究保管机构，敦煌研究院进入依法管理、科学保护、研究创新的新阶段。首先，敦煌研究院坚持依法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严格遵守国际和国内的文物法律法规，而且协助甘肃省政府起草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不仅自身完全严格执行各种法规，也坚决阻止社会上一切对莫高窟的违法行为。同时，莫高窟的保护是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敦煌研究院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及国际文物保护理念，与国内科研机构合作制订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作为保护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依据，并规范和提高了有效保护管理的水平。

接下来，樊教授重点介绍了敦煌研究

院在敦煌保护研究工作中开展的各项研究与取得的诸多成就。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工作，遵循着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这也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针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制订的最高理念。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敦煌研究院通过与美国盖蒂保护所的合作，建立了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并初步建立了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的预防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为了永久保护、保存和永续利用敦煌石窟的信息，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实验、探索、研究和实践，成功地利用数字技术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在这一过程中，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在中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在保护的同时，敦煌研究院也积极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发展，不仅对石窟壁画图像、石窟美术、石窟考古、敦煌文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整理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专题分类26卷本）、《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具有系统的、总结性的研究，还创办了学术期刊《敦煌研究》，成为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刊物之一。敦煌研究院也很重视图书和信息建设，搜集了近16万册与敦煌学相关的专业图书和文献，并与中国知网（CNKI）合作初步建成了“敦煌学信息资源数据库”。

旅游开发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如何既保护莫高窟，又保证游客参观体验？就这一话题，樊教授向与会者详

细介绍了敦煌将旅游开放与洞窟保护管理相结合的种种创新旅游开放管理措施。首先，在开放洞窟中安装传感器，常年监测开放洞窟的游客流量、监测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开展旅游开放洞窟微环境变化与洞窟壁画病害相互关系研究，为开放洞窟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经过近十年大量调查、实验和分析，敦煌研究院得到了莫高窟开放洞窟内最适宜的相对湿度、二氧化碳含量、开放洞窟面积、游客最大承载量等准确科学数据。在此基础上，认真执行准确的莫高窟日游客承载量，将以往游客进洞参观的单一模式，改为先观看敦煌数字影视节目、后参观莫高窟洞窟的新参观模式。这种新的展示方法，使敦煌日游客承载量提升了一倍，既减轻了洞窟压力，又使游客得到更好的参观体验，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为实施有效的游客管理，敦煌制订并严格执行有利于保护洞窟文物和游客观赏的洞窟开放标准、洞窟开放使用管理制度、预约制度、洞窟监控办法。正是如此科学、严格的旅游管理，使得敦煌研究院负责的莫高窟遗址旅游开放与管理工作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为世界遗产旅游管理的最佳案例和国际上践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佳案例。

樊教授的主题演讲，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充分肯定，各位学者纷纷谈及自己对樊教授演讲的感想与体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孙庆伟教授谈到，他从樊教授的演讲中最核心的体悟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力量”，虽然樊院长外表看上去很瘦弱，但她的讲话中却蕴含着力量，这种



力量来自知识，来自责任感；第二个是“典范”，敦煌从40年代以来，面临很多问题，面临自然的、人为的破坏，还有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经济大潮之中保护文化遗产，而敦煌的成就被评为联合国的最佳范例，这方面樊教授是居功至伟的。这两个词都是值得当今的学子深入思考的。作为樊教授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亲密伴侣，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彭金章先生追忆了自己从夏商周考古转向敦煌考古的学术历程，并重点讲述了他主持敦煌石窟北区考古发掘的经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讲述了樊教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个小故事，充分肯定了樊教授、彭先生在敦煌保护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并强调了考古学的科学提取、科学记录对于文物保护、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

荣新江教授则介绍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他以自身的研究经历表达了对樊教授支持学术事业、提携后辈的精神的赞扬与感激，通过具体实例展现了樊教授、彭先生和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在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对今后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各位与会者发言之后，在现场旁听的同学们也就各自感兴趣的部分向几位嘉宾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最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作了总结发言。本次座谈会在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杨光)

## 02

### 尾崎文昭： 周作人思想的分析试探



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尾崎文昭先生做客“北大文研论坛”，为北大师生作主题为“周作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崎文昭做客“北大文研论坛”并发表演讲

人思想的分析试探”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主持演讲，中文系系主任陈晓明教授，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吴晓东、王风、贺桂梅、蒋洪生、张丽华，以及相关领域校外专家出席并与尾崎文昭先生展开了深入交流。

陈平原教授介绍，1980年尾崎先生作为最早一批日本留学生来北大交流，跟随王瑶先生学习三年，并且在回国以后一直热忱帮助中国师生赴日交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尾崎先生更与几位日本友人资助中国学界创办《学人》杂志，使之成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份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学术杂志，不仅深情可感，而且影响深远。尾崎先生回忆自己追随王瑶先生学习的经历，认为那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期，他每周一次到老师家里谈话，每次都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向老师请教，与老师、同学之间的情谊一直延续至今。

尾崎先生这一次的演讲，缘起于他对东京大学伊藤德也教授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与周作人》一书的意见。他充分肯定伊藤教授著作对于周作人20-30年代思想研究作出了重要突破，并且认为此书尤其以“颓废”论解决了学界过去没能解决的问题，即周作人在20年代前半和20年代后半到30年代的思想脉络的分裂问题。但与此同时，尾崎先生也提出了疑问，以为按照这样的分析角度恐怕很难解释40年代以后周作人的思想脉络。他因此提出，应该先把20年代前半与40年代的思想连贯起来，然后再把伊藤的分析嵌进其脉络上。尾崎先生假设：在20年代前半的要求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呼吁在

现实情况上已经失效以后，周作人调整了自己的立论，把原来的追求思想革命与参与社会改革的欲望，变形为“颓废”论而继续。而在沦陷时期则采取正面“救亡”行为。这样看来，周作人30年代的“无用之用”论很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

随后，尾崎先生集中论述了作为周作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论的问题。他提出，如果我们把抗战结束以前周作人的思想分为四个时期，即东京时期和“五四”时期、“五四”退潮期、30年代、沦陷期。分期考察周作人对于儒家的态度，可以看到：第一期，比鲁迅还要拒绝。第二期，开始儒学复兴运动。第三期，以非政治主义的态度把儒家言说限制为日常生活的伦理思想，以致大幅度改变了儒家形象。又以“出世”态度而“入世”这种逻辑，缓和了自己的矛盾。但也不忘儒家的“智”和“勇”。第四期，主张原始儒教，认为其模范是大禹、仁就是恕与忠，以此逻辑恢复了五四时期的“既是利己，又是利他”的伦理观。又以“仁”的逻辑，在被占领的情况下主张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尾崎先生认为，按学理来说，此种儒家人文主义可算是儒学的现代性改造。

通过对相关具体篇目的分析，尾崎先生提出：显然，周作人的“儒家”不是历史上的“儒家”。而是为救济民族并加强民族意识而假设建构的概念。这就印证了他的假设，即周作人是“先把现代观点能够肯定的历史上的有些言说选择出来，据现代的观点改写历史和传统，以此盖在现代之上，由此把自己的现在的观点和立场正统化：这就是30年代以后的周作人的

基本战略”。因此，与其说周作人变成了儒家，不如说是周作人将他眼中的中国文化精华称作儒家。如周作人所说：“中国现今本来还是革命尚未成功，思想界也依然还是旧秩序，……我想思想革命有这两要点，至少要能做到，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可见其40年代的讨论，还是在20年代“思想革命”的线索上，并非如伊藤教授所论，40年代是周作人思想的异类，只有30年代才是典型的周作人思想。

在交流中，王风教授提出：周作人四十年代有其特殊之处，一是要对自己作形象上的辩护，二是要保持批判的立场。为什么相比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会有变化，是因为他批判的对象和批判的方式变了，而非思想上有剧烈的变动。首都师范大学袁一丹教授指出，周作人的儒家论，既有一贯性，又有策略性，有时是非常语境化的，特别难以拿捏的是名与实之间的关系。高远东教授提出，从周作人的想法来讲，一方面儒家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另外儒家思想也为当时日本所容纳，是东方的意识形态之一。周作人利用儒家也好，不想冲突也好，都不是学者的方法。

吴晓东教授则提出：用现代性来解释周作人可能有点隔，周作人自己有“半是儒家半释家”的表述，在儒家以外，也许应该引入佛教的线索。而我们整体性的视野也许也应该加以反思。贺桂梅教授提出，周作人借用传统的合法性，有没有可能是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了西方没有的东西，要在发现的过程中创造自己的东西。

陈晓明教授则提出，应该关注周作人的资源，我们知道鲁迅有尼采的思想，那么能不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周作人？将儒家与颓废放置在一起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张丽华教授提出，周作人对于希腊化时代的关注，也许和“颓废”的问题有关，他对于希腊化时代的认识，影响了他对于现代的理解。而在儒家论与新文学并置的问题上，有两点应该引起注意，一是周作人对于韩愈的一如既往的批判，二是相比于三十年代周作人以对抗左翼为论述的目标，他四十年代讨论儒家的语境，还应该得到更多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春凌研究员则认为，从周作人整体来看，还是更偏向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包括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从思想史的脉络上来看，颓废是特例，很难说是主流。

最后，陈平原教授结合演讲与提问，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我们不能从今天的学术标准出发来要求五四新文化人，从认识的敏锐与深刻而言，在他撰写《中国散文小说史》时就注意到，周作人对于六朝以来直到晚清的散文，有非常独到的眼光，在众多学者中水准最高。五四新文化人的思路是建构经典。或许这就可以看出现代学术的宿命：没有武器，就没有办法面对传统。但是有了武器，又会被质疑是否还是传统。

尾崎文昭总结说：鲁迅与周作人，他们本身是现代性的儿子，颓废本身是现代性的结果，对于社会主流他们会有抵抗，不认同大的潮流。鲁迅说，文学是中国没有过的。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其实接受

的完全是西方文化，他们会完全否定的都是旧的东西。周作人为什么要讲儒学？其实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否定传统的观念，可是离开传统文化，又确实难以存活。所以他的态度并不是认同，而是可用，这是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在研究过程中，

应该注意透过鲁迅与周作人表面的文字，去体会他们实际的态度，看他们到底要讲什么。要注意到他们的文字有时并没有讲事实，却讲出了真实。

（撰稿：张一帆）

### 03 黄进兴： 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 及其衍生的问题



台湾中研院院士黄进兴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开研讨会

9月16日下午，“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迈向论述化、命题化的哲学”主题座谈会在静园二院召开。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与北大历史学系广大师生，就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史进行了深入研讨。四川师范大学张邦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欧阳哲生教授、陆扬教授、叶炜教授等参加了讨论会。

黄院士首先提出，文、史、哲三科虽然在研究对象上有所重合，但在研究取径上却有较大差异。文学研究者常常抱怨史

学、哲学研究对文字的解释不够准确，史学家则诘难文学、哲学研究忽视思想史的时空架构，哲学家的批评则主要聚焦在“缺乏架构”上。上述批评也不一定是单向而没有回应的。曾有一位中国哲学研究者运用西方哲学解析的方法研究南宋朱陆异同的问题，就引起了中文系的教授不满。

当然，当前的西方哲学界正对解析的方法进行反思。法籍哲学史名家哈泽（Pierre Hadot, 1922-2010）的思想曾对晚年福柯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西方



上古哲学的精髓在于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抉择，而非理论概念的推衍。一个决定性的例子，就是那些上古的哲学家全无著述，连一个手写的字都没留下来。黄院士认为以哈铎的观察为基点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反思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西方哲学不断影响着中国思想的造作。二是依靠中国哲学史的疏理进行哲学研究，而西方哲学研究从19世纪开始就已摆脱哲学史的议题（对这种状态的否定要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截断众流”的巨著。胡适在1958年回忆这部著作时，特别强调其是以“名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之后的学者，包括反对胡适的学者如牟宗三、梁漱溟等，都继承了胡的“方法论”，即以逻辑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正如稍晚的劳思光所提出的：“中国人不曾建立逻辑，因此自己未发明思想上的显微镜，但不能说思想上的显微镜不能用于中国思想的考察。”当然，以“方法论”的意识引领学术是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

胡适以降的哲学史家在继承“名学的方法”同时，又深受各派西方哲学的影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做，冯氏实则深受西方新实在论的影响。侯外庐的哲学史著作深受唯物论影响，自不待言。台湾的中国哲学史家劳思光转着意于批评冯友兰，他的著作鲜明地运用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清

晰明确，条理井然。简单来说，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语言趋于将传统的充满隐喻的修辞变成类似几何证明的客观论证。

“傅斯年的贡献或许被大大低估。”黄院士认为，胡适晚年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而不提“哲学”，应受傅斯年影响。因为傅氏就强调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所有的哲学，尽多到苏格拉底那样子而止。这一看法本身就对近代以来单纯运用解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反思价值。黄先生顺带批评了当前有关傅斯年的史学史研究，强调傅斯年继承了不是“兰克学派”，而是流行于1890年代的“新西兰学派”。他进而提示：研究某人具体的史学观念，理应对此人接触到的西方思想思潮进行细致分疏。

黄院士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宋明理学的功夫的重点在于成就自身。而近代以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大体是根据西方的思想来整理中国的论证，如牟宗三即以康德的框架来断定宋明理学的正统与别宗。而根据哈铎“哲学在于个人道德的成就”的观点，与牟氏同属“新儒家”的唐君毅的解释或许更为成功。因为唐氏的论著总是迂回曲折地表达某种切身的体验。当然，将上述“反思”落实于实践似乎还有若干问题：且不说哈铎本身频频受到“反哲学”的指控，即如何探索传统儒家思想的实践面都面临不小的困难。

北大历史学系陆扬教授率先分享了自己的“听后感”。他认为黄先生的讲座提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哈铎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思想，值得东亚思想

史研究者的重视。

其次，黄先生对胡适两部著作的演讲涉及了“哲学”和“思想”两个概念的区别问题：对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区别，西方学界已有一定认识。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前言中也已提到这一问题，特别是到底从生活抑或道德的角度描述思想结构的问题。陆教授同意黄先生对胡适的观察，并补充了胡适和杨联陞的书信中频频讨论到中古思想史的情况。对于胡适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原因，陆教授认为他一方面是为了上古思想史遗留的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或许是与陈寅恪存在某种竞争。

关于傅斯年，陆扬教授同意黄先生认为学界严重低估其思想的论断。并指出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原则和他自己在讲义中的说法差别很大，或许从侧面造成了我们对他的误解。傅斯年

对诗经相关问题的完全触及后现代史学所提出的语言问题，不应以“史料学”视之。

北大历史学系欧阳哲生教授对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补充。总的来看，他认为傅斯年、胡适师生之间终身保持互相影响的特殊关系，傅斯年较早就向胡适提出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看法，受到了胡适的重视。黄院士进一步提出“傅斯年是老师的诤友”，并表示傅斯年“中国没有哲学的看法”体现了傅氏对西方哲学具有分辨力。他最后强调：西方哲学的学术取径变化很快，如解析哲学言哲学重在分析，维特根斯坦则言哲学是一种治疗。不同学派对“哲学”的定义迥异，谈论这些概念务须谨慎。后现代打碎了整体论的观点，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如何在破碎中重建现代学术的问题。

（撰稿：胡斌）

## 04

### 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



2016年10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四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为主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主持论坛；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古典学教授裴吉·杜布瓦（Page DuBois），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北京大学人



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布鲁斯·林肯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

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加论坛。

王铭铭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心与边缘”研究的历程。他指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才在中国大陆流行。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例如费孝通讨论皇帝、士绅与农民的关系，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顾颉刚所代表的疑古学派对神话与传说的研究以及张星烺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等，讨论的都是两个或多个板块的平行关系。1949年之后强调“中央”的概念，在学术观念中也随之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二分的认识方法，但仍与“中心”、“边缘”的概念不同。70至90年代，台湾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如王明珂等开始使用“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此后大陆学界逐渐接受并使用这一概念。

与会嘉宾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林肯教授认为，“中心”是一种多元性的汇聚，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心具有更强的军事力量，二是边缘的财富汇

聚到中心，三是边缘对中心文化上的仰视。中心之所以成为中心，主要在于军事力量。但是中心并不希望经常展示武力，中心民族会建立某种意识形态，在其历史的或宗教的叙事中表现出自己对其他民族更优越、更道德、更神圣。只有在其他民族不能接受这种叙事从而进行反抗时，中心民族才会展示他们的武力，而在此之后，被征服者便不再质疑和挑战，而是转向对中心的模仿。

王斯福教授指出在中国的仪式体系中，都存在着纵向的中心概念，例如在气功中纵向的自己是中心，而同时还要有横向的气的修炼；又如在风水中存在一个九宫格式的体系，中心是纵向的，而四周都是横向的。他进一步提出，在中国，最高的最神圣的地方往往不在中心，而在外部。例如北京城中最高的建筑是用来祭天的天坛，却不在紫禁城之中。

杜布瓦教授则从人文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与社会科学学者不同的见解。她认为中心与边缘不是固定的，关键问题是寻找不同的中介机制，并需要对其形成的复杂性做历史的叙述，并举希腊文明以及女性在

不同文明中地位的例子作为说明。

三位西方学者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嘉宾的激烈辩驳。渠敬东教授指出林肯教授是用政治经济学对伦理学、神学进行了解释，而其中具有一个逻辑上的难题，即当我们认为力量是成为中心的根源时，实际上已经消解了中心的概念，而并没有体会到中心与边缘在实质上的含义。他又指出杜布瓦教授重视交互性的概念同样也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即当把中心和边缘的问题还原成一个中心融合与中介机制的问题时，其源出的问题则无法解释。渠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明体系是由宣权、祭祀、封禅等不同中心组成的，不同中心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内在整合问题，是讨论中国中心与边缘问题的核心所在。

吴飞教授认为，讨论中心与边缘有两个思路，一是现实格局之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二是文化理念、意识形态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二者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他还强调应该在世界格局变迁中理解中心

与边缘，不同文明之间可能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这一中心是不断变动的，同时每个文明内部也有自己的中心与边缘。此外，他还对王斯福教授所举的气功与天坛的例子提出了质疑。

在论坛的最后，王铭铭教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自相矛盾的双重动机，即内向的发展与帝国的气质。而中国直接从帝国体制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更为特殊，这其中有很大的难度，也带来了一些恐慌。他主张不要用二元论来看待世界和国家，因为二元论恰恰是国家的产物，而中心与边缘同样是一种二元论。

论坛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与会嘉宾激烈交锋，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充分体现了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论坛在与会学者和听众的意犹未尽中落下了帷幕。

（撰稿：熊昕童）

## 05

### 包乐史： 比较视角下的莱茵河 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2016年10月1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比较视角下的莱茵河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主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担任论坛主持人，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共同邀请，于会上作同主题发言，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



与研讨。

包乐史教授从河流水系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讲起。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动脉和静脉，没有其他任何自然景观像多变的河流一样受到人类文明的干预和管理。城镇的兴起和繁荣也往往与河流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包乐史教授作主题发言

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河流旁边组织城市生活不仅可以利用便利的河道运输，降低物资流通的成本，合宜的气候、丰富的自然环境资源更有助于人口的繁衍增长。

河流之间有可管理和难以管理的区分。包乐史指出，将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并举首先基于二者区别于其他流域的相似特点：其一，二者均为相对可控的河流流域；其二，两大三角洲具有密集城市网络，是从13世纪到目前经济持续发展的温床；其三，中国江南和欧洲低地国家的近代早期产业革命的兴起都得益于对水道的使用。包乐史认为，大河文明的兴盛和繁荣基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在对河流与文明发展的研究中，即便我们并不认同前辈学者如魏特夫（Wittfogel）在《东方专制主义》等著作中“河流决定论”的表述，也仍然不能忽视河流对流域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所有伟大的历史文化都沿着“大河”这一“自然高速公路”发展兴盛，即便是例外的部分海洋

文化中，海洋有时也像河流一样服务于文明的发展（如马来群岛）。另一方面，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最西方与最东方，是17、18世纪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鹿特丹港、上海港等两大三角洲

的港口在今天依然是世界贸易联合的重要关联点。从13世纪（约中国的宋朝）开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欧洲，两大河流域的城市虽然一直在发展，却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的比较研究也就具有了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学术意义。

包乐史教授通过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向与会师生展现了莱茵河与长江在流域面积、水系与运河分布、往来船只设计、桥梁结构、海运和内陆交通、流域城镇规模与文化风貌等方面的相似与相异之处。包乐史教授指出，港口是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窗口，而相比之下，港口所依托的“腹地”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腹地，海港才有延续和发展的生命力。

包乐史教授最后就河流与工业社会的关系进行阐述。一方面，机械化手段的广泛应用使得人类“驯服”河流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河运的范围和规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利用率的提升，河道污染、航运标准化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沿河所有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在欧洲，

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莱茵河便将沿岸各国紧密关联到一起，成为国家交往的“桥梁”。

发言结束后，李孝聪教授、包乐史教授与参加论坛的师生们就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流域整体发展、政权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深入交流和讨论。李孝聪教授发言指出，长江和莱茵河有着一项重大差别，莱茵河面临国际条约的签署，但长江不需要，因为长江只属于中国一个统一国家。而相比之下，横跨中国和泰国、老挝、越南等东亚国家的“湄公河水道”则与莱茵河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是值得关注和比较的对象。此外，李孝聪教授还谈到了此类研究的困难之处——了解长江的不了解莱茵河，反之亦然。东西方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若能在欧洲和中国学者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对

话与合作机制将对研究的实质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包乐史教授表示，中西方学者在流域发展、污染问题解决，以及内陆、河运和海运交通等方面面临着共同问题的挑战。在比较视角下探讨长江与莱茵河的案例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本人也将继续密切与中国学者在该问题上的交流，并致力于推动相关国际学会的召开。

论坛最后，李孝聪教授作总结发言。他高度赞扬了包乐史教授在推动东西方两大河流域比较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本次论坛的主题和研讨过程都充分贯彻和体现了文研院“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基本宗旨，尤其在激活思想方面，对在座的师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撰稿：丁洁琼）

## 06

### 游离与独在： 木山英雄的学术与思想



10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期“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的学术与思想”主题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召开。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木山英雄出席座谈会

北大文研院的特邀访问教授、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木山英雄先生作为主讲嘉宾出席座谈，与校内外诸位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京华研究员担任翻译，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鲁迅博物馆、北京市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与研讨。

木山英雄先生已有三本著作由赵京华老师译为中文出版，分别是《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苦住庵记》，以及今年出版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木山先生对于鲁迅、周作人文学与思想的论述，对于聂绀弩、杨宪益等人旧体诗词的论述，不仅早已成为经典，而且至今仍有丰沛的生命力。这一场讨论，既关涉《人歌人哭大旗前》这一本新书，同时也表达诸位学者对于木山先生整体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魅力的体味。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洪子诚首先发言。洪老师指出，他最近同时阅读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与钱理群教授《岁月沧桑》两种著作，二者都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可以对照阅读。钱老师书仍然属于综合研究的传统，木山先生书则通过对旧体诗词的笺注展开叙述。木山先生这一本书，既有细密的文本工夫，又有与当事人的沟通，提供了很多细节。他对于中国当代史既有情感上的关切，又有意保持了置身事外的距离感，这很不容易。在节制的文字中，有很多细微之处需要读者用心体会。

随后，鲁迅博物馆前馆长、研究馆员王得后先生回忆了他自1987年以来与木

山先生的交往。他认为，木山先生有非常深的人道思想和人道精神，他曾提出鲁迅对社会、人生有肉体的痛感，提出周作人作为“失败者的反抗”的意义，都是特别值得深思的认识。

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认为：木山先生既保持了游离与独在的姿态，同时又是20世纪的同时代人，并非真的出世。今天回看20世纪，比较正面的经验就是各国之间所保持的“同时代性”，即各个国家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共感，有切身的同时代感。在木山先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身上，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同时代感，这种身体性的、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研究的经验，是在消失，而不是重新集聚。此外，他认为还应从木山先生的研究中注意到，木山先生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非常多面的，最初是拿来思考日本自己的问题，才进入到中国革命的问题里来谈，于是中国革命本身就不再是抽象的东西，即使写作的是局部的、个体的经验，但是在解读之中却透出对整个时代的理解，这种深广的程度也是这个时代所赋予的。

鲁迅博物馆姚锡佩研究员提出，木山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不回避战争的事实，抱着抢救的心情，以具体的研究呈现出更为真实的周作人的面貌，这给她很大的触动。而在《人歌人哭大旗前》这一本著作中，木山先生不仅走出书斋、辛苦走访，并且把研究对象的心理活动都呈现出来，这就使得这一本书格外厚重。

南开大学张铁荣教授回忆了他与木山先生三十年来的交往，尤其指出木山先生

是一个国学深湛的幽默的学者，他的幽默感与他的游离感也正息息相关。

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石教授指出，木山先生在日本的研究者中间，最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对待问题，他总有他自己的独到的思考，能够提出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并且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这给他很大的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严安生教授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因此与时任日方主任的木山先生有很深的交往，他认为木山先生是性情中人当中的极致，他的选题，如果没有对于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与心情，是不可能的。他还希望年轻学生能够学习日语，直接阅读木山先生的原文。将木山先生原文与赵京华老师的翻译相对照，是最好的学习语言与学问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董炳月研究员回顾他与木山先生的交往，也回应了汪晖教授提到的同时代人的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刘春勇教授则提出，木山先生对于《野草》的论述给他带来了穿透性的认识，木山先生的研究超越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局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林荣教授指出，木山先生能够独创属于木山的文体，能够震动中国学者的心，也使得中国学者反省，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压在我们身上的知识分子受难精神史发掘出来。其实今天仍然有值得关注的共同的学术命题，但是学者往往面临价值固化，从而失去了寻求突破的能力，相比之下，木山先生则始终情怀如一。

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指出，“游离与独在”特别符合木山先生的学术与为人，是将木山先生思想个性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了。他认为，木山先生的为人，就是不与主流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持清醒与独立性，既难以把握他的思想立场，又能看到特别坚定的政治性，这一点极有魅力。此外，木山先生思想的敏锐也值得后辈学者学习，他不断求知，对于最新的理论不断跟进，这使得他的学术一直保持新鲜活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认为：“游离与独在”是木山先生主动选择的姿态。这种感觉用来讨论鲁迅，也是最恰切的。独自远行，想独自占有黑暗的世界，这就是一种独在的感受。各种姿态的孤傲的靈魂，只有像木山先生这样才能真正体验。木山先生曾经提出：鲁迅的最后一个哲学性的自觉，是人到底没有终极自我。因此木山先生的哲学性，就不是抽象于历史性的，而是经过了历史性的检验。此外，这一次重读木山先生著作，他还感受到木山先生身上具有一种东方智者的幽默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春凌研究员指出：木山先生的很多著作，实际上是20世纪心灵史的连贯性的考察，其表达往往是在文体的边缘层面的，是曲折性的。今天的年轻学者很难打通来看20世纪，因为精神上已经不属于20世纪。她认为，今天的21世纪和19世纪末很像，要向世界来说中国，对于20世纪的革命中国却往往难以理解，因此木山先生的著作，及其提供的细节就格外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林分份教授认为，木山



先生当面的报告和他的学术风格差别极大，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学术的真正的兴趣，这驱使他选择了一些旁人很难想象的题目。木山先生的写作风格，其节制与绵密，也给人以很大启发。

最后，木山先生致辞。他提出，和他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竹内好、丸山昇、伊藤虎丸等都已经过世了，因此在得到大家表扬的时候，他也希望大家能够想到这些学者，将他们放到一起来谈。他还开玩笑说，中国古代有“生番”与“熟番”的说法，讲野蛮地带的人接受外来统治而

被文明化，对统治者来说，看到生番变成熟番是很喜悦的事。日本虽然并没有接受过中国的统治，但是作为一种比喻，却觉得这里很有意思，他尽了很大的努力解读旧诗词，写成这样一本书而得到大家的表扬，也许也要被看作是“熟番”了。日本自古以来一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后来才有本民族的自觉，有文化上的独立，这一过程，也还是值得肯定。他非常感谢大家组织并参与这一场讨论。

(撰稿：李浴洋)

## 07

### 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

2016年10月22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七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为主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渠敬东教授作了简短的引言。他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学界面临着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文本与田野、问题与方法、汉语写作与英语写作这五大关系与矛盾，使得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国家秩序，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议题。



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文研论坛

周雪光教授指出，他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历史脉络，如果不借鉴历史学，只是按照自己所熟知的知识体系寻找答案，就好像刻舟求剑一般。周教授提出了他在学习历史学的过程中遇到的几个问题：首先，历史学对于正式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非常丰富，但对于非正式制度研究相对较少，影响了我们对于传统国家秩序的认识，历史学如何在史料解读和理论关怀上把握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多是以断代史或专题史为主，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历史背后的总体脉络，如何促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也值得思考。

邓小南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周雪光教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阐发，并重点介绍了其最近研究的信息渠道问题。相较于渠道的建设，她更关注渠道关节处的“开

关”。邓教授指出，国家秩序通常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一定政治实践倒逼的产物。一般认为秩序是制度带来的，又靠制度维系：一方面，秩序的运行需要经过适应性的调整，包括一些非制度因素的补充；另一方面，秩序不只依靠单纯的制度，而是在制度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些非体制的，甚至是在公开场合下被制度防范、摒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帝国体制本身所依赖的补充方式，而这背后又体现了制度文化的渗透作用。所谓制度文化，既包括制度规定本身，也包括制度的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动以及他们彼此的周旋互动关系。一方面，特定制度能带来相应的制度文化，另一方面，制度也会被制度文化所包裹。在现实政治秩序中发挥作用的不仅是朝廷的意志，还有围绕制度的多方面认知，以及在政治实践中的冲突和博弈。

蓝志勇教授从行政管理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行政管理的核心意义是行使政治权力，它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统治的工具。行政的执行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表达，反过来也影响国家的经济能力、文化能力乃至政治能力。蓝教授提出五点认识：第一，中华治理传统是多种方式和逻辑并存，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中央对地方管理的行政逻辑；第二，治理是善变的，中国乃至世界治理的思想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它有相关性但不完全一样，甚至有跳跃性的可能，过去的逻辑不一定是今天或者未来的逻辑，东西方逻辑纵然不同，但仍然有相同之处；第三，传统的方法在解决现代公共行政的问题上确有不足，传统方法服务于帝王，现代方法服务于民权；第四，新儒家可能不是儒家，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核心理念如果被平等思想替代，就不再是儒家了；第五，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还需要更深度地发掘。

李强教授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双重视角谈了其对中国国家秩序的看法。他首先指出在政治学研究中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国家好坏是一个社会治理好坏最核心的问题。国家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黑格尔说的“有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体现，是一个共同体精神的凝聚；另一个层面是指政权，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合法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组织。李教授认为，如果按照韦伯对于现代国家的定义，那么中国自秦代起就已经构建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但是，在传统中国，国家渗透社会的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税收制度相对落后。换言之，

传统中国国家的权力在理论上是无限的，但是能力却是不足的。

周黎安教授从地方权力的角度阐释了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他认为在中国官僚制度科层制的外壳里，其核心却是发包制。改革开放初期，重启地方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既有资源又有激励，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化。但是自9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垂直化改革、税收制度改革都在肢解地方政府的权力。然而，制度的惰性仍然存在，过去的制度时刻有可能回归，那么这种变革是否是系统的、持久的、质的飞跃？全球化、市场化、一体化，信息化和自媒体的发展，老百姓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增长，都使得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跨学科的扎实研究。

李猛教授认为马克思·韦伯对国家的定义有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合法性、和平化和官僚体制。在运用到中国政治统治的时候，学界倾向于接受这种定义，但其中原因值得反思。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社会在儒家化之后强调的政治观念符合合法性的定义，中国政治也是长期和平化的，而且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官僚体制。但是仔细研究即可看出其中的问题。首先，韦伯所谓的合法性概念是自下而上的，而中国的传统秩序中每个人的身份来自于天子，因此这种合法性的授权是逆转的；其次，和平化运用到一些混乱的时代或者少数民族政权时就产生一些问题；第三，对于官僚制来说，韦伯所谓的官僚制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是共同体层面上的，作为社会关系和作为共同体关系

的官僚体制在意义上是截然不同的。

景跃进教授指出，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这不仅是就其现状而言，更就其思想和知识系统而言。既有的政治思想系统已经无法应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情势。目前，社会科学广泛存在概念不适的情况，必须要寻找其历史传承的影响。这种话语的不适应该被积极看待，它恰恰说明这是催生新理论、新范式的契机。现在，什么都没有答案，什么都需要探索，社会科学必须与人文科学充分交融，现实研究必须结合历史分析，才能真正促进学问的发现和增长。

在社会科学学者发言之后，侯旭东教授、刘后滨教授和叶炜副教授三位历史学家也针对会议主题作了发言。

侯旭东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早期帝国时，他更关注运行机制问题。侯教授认为，传统中国的君臣关系可以分为礼仪型君臣关系和信-任型君臣关系，前者是一种例行化的运作，后者以君宠为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礼仪型君臣关系主要为了维系国家的秩序，但其中也包含了很多消极因素，会使臣民产生离心力；而信-任型君臣关系则是资源、声望的再分配，会产生向心力。皇帝有三种形象：一是皇帝个人，二是政府的首脑，三是观念中圣君的形象。而第三种形象是儒生士大夫制造出来的，所以儒生士大夫在传统国家秩序研究中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刘后滨教授从律令制的研究入手对传统中国的国家秩序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律令制的规定其实是非常周密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渗透力，而不能仅仅视为“具

文”。有些学者强调潜规则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缺乏显规则，潜规则就没有了依托。

叶炜副教授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解读了传统中国的国家秩序。以往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侧重于其矛盾的一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双方还有追求利益一致性的一面，特别是皇权一直在努力地追求地方与其利益的一致化。具体来说有三种方式：一是血缘手段，例如西汉、西晋、元代和明朝前期都存在“宗王出镇”的现象；二是身份手段，主要表现在给地方官加中央官的官衔，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央官的身份；三是机构手段，即建立一种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构，汉代的州、北朝的行台、唐代的道、宋代的路、明清的总督巡抚莫不如是。除了以上这些政治性的手段，还有一些经济性的手段，例如唐代的两税三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论坛持续了三个小时，现场座无虚席。与会学者纷纷表示，参加如此大规模跨学科的对话还是第一次，历史学者与社会科学学者都希望能够互相学习，显示了这种多学科的、特别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交流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作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流的平台，还将继续举办跨学科交流论坛，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

（撰稿：熊昕童）





## （四）静园雅集

### 01

#### 王风：琴史、琴器、琴曲 ——古琴漫话

2016年10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静园雅集”系列活动第一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讲人王风教授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其学术文字精纯古雅，清通可诵；而王风教授之于琴学之研究，绝非外行玩票。王风教授师承故宫琴学大家郑珉中，故其琴学研究不仅足称当行本色，更饱含人文学者内在的清朗文气。作为“雅集”活动的开篇之作，王风教授以“琴史·琴器·琴曲——古琴漫话”为主题展开演讲，为在场师生分享自己在古琴领域的“漫谈”。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坂元弘子教授及王风教授的母亲均在场旁听了本场讲座。

第一部分是“琴史”，王风教授探讨了古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问题。古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直很高。从传说的角度来看，就有伏羲斫琴、神农斫琴之传说；而越是推及久远者，通常地位也就越高。《诗经》中约有十处关于“琴”的说法，其中大部分是“琴瑟”合说；而从《左传》来看，则有许多“琴”

独用的场合，“琴瑟”共同出现的场合反而较少，这说明春秋战国时，琴已从众多乐器中凸显出来。春秋战国时的琴师，称其名通常冠以“师”字，这说明琴师已成为一种专门化的职业。魏晋时期，琴文化在士与文人的接触中凸现出来，琴在众多乐器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正如嵇康在《琴赋》中所言，“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宋以后，逐渐形成“琴棋书画”的说法，这四种艺术成为文人必备的修养。其中，琴在上古地位就很高，上古以来也一贯保持较高地位；相比之下，棋在上古地位较低，而书画也是在魏晋时期才开始流行。此时与其他三者取得相同地位的琴，其地位实为下降。在四部的分类中，琴已不归在经部乐类之下，而归在子部艺术类之下。宋代文人中也不乏对琴的批评，在他们眼中，琴已非上古时地位甚高的乐器。

第二部分是“琴器”，首先，王风教授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古琴结构图，并向在场师生介绍了古琴的结构。古琴有七根弦，其板甚厚，音量较小；其下龙齿凤爪为出音口，琴面带轆轳而粘合，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现场弹奏古琴

中有空腔，如此形成基本琴体。弦从岳山架起，绕过龙眼，绑在底下的雁足上，如此形成琴弦。自岳山到龙龈形成有效弦长，即有效振动部分，琴弦离琴面很低。演奏方法，右手弹拨，左手按弦。由于弦数较少，须靠指位取音，指法繁复。古琴整体结构取像人形，有额、颈、肩、腰，龙齿、凤爪出音，雁足既作支撑之用，又作固定弦之用。徽位发泛音，而古琴有效弦长超过一米，故韵长、余音长，且泛音取位多。

随后，王风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古琴各种不同形制的图片。其中，仲尼式现在是最常见的，占80%以上。这些形制的名称，最多直接以古人命名，如神农式、伏羲式、仲尼式；其次取龙凤之像，如凤势式；再次才直述形状特征，如连珠式。关于古琴器辨伪的问题，王风教授指出，

唐代没有伪作的古琴，宋代才开始大量伪造唐代古琴。王风教授为我们展示了多个例子，从形制、刻款、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变化等角度为在场师生分享自己的鉴琴之道。王风教授强调，用琴的声音进行断代极不可靠，主要的断代依据仍应是制琴工艺。

王风教授将一张自己的高师祖黄勉之、师祖管平湖都使用过的琴带到了讲座现场。王风教授简单介绍了这张琴的形制、刻款等特点，这张琴的头、腰部做法柔和漂亮，背部刻有“梅梢月”及两张印，应为清物。随后，在现场师生的掌声欢迎下，王风教授用这张琴为我们弹奏了一段古琴曲，在场旁听的师生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段瞬间。演奏完毕，王风教授又解释说，古琴如果长期不弹，需要拿出来弹一段时间，音色才

能恢复。本以为这部分就将在这悠远绵长的古琴曲声中落下帷幕，谁知操琴有年的王风教授逸兴忽起，又为我们弹奏了一曲。

第三部分是“琴曲”。王风教授首先展示了藏于日本的我国最早琴谱《幽兰》的图片，该琴谱作于唐代，也是唯一流传的文字谱，为晚清时郭守敬在日本发现。古琴谱是指位谱，只表明手在弦上的位置，没有“一板一眼”的节拍。在文字谱《幽兰》中，说一个音需用几十个字，极为繁琐；而清代古琴曲《仙翁操》，其谱则使用了汉字方块字的结构记谱，简明生动。

王风教授指出，现代人的耳朵听惯了西方音乐，用对西方音乐的审美去听

中国古典音乐，表面上在听古琴，实与古人听古琴曲的感受不同。王风教授随后带领在场师生一同欣赏了管平湖先生演奏的《流水》、《幽兰》和《广陵散》，以及吴景略先生的《梧叶舞秋风》、女琴家乐瑛的《沧海龙吟》、兼具琵琶演奏特色的演奏家卫仲乐的《渔舟唱晚》。

最后，王风教授谦称本次演讲是自己拼凑出的“漫谈”，而这恰与“雅集”系列活动的主旨要求不谋而合。伴随着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主持人韩笑老师再次感谢了王风教授的到来，并预告了下一期“雅集”活动的内容。

(撰稿：施朝)



书法家李双阳即兴挥毫，现场临摹王羲之的《十七帖》

## 02

### 祁小春： 王羲之的《十七帖》诸问题

2016年10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静园雅集”系列活动第二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由文研院本学期邀请学者、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祁小春先生带来主题为“王羲之的《十七帖》诸问题”的演讲。雅集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主持，

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朱青生教授参加了本次活动。在书法艺术方面，《十七帖》使用了王书中致近亲的书体，亲切温润，具有平易之美，与书信内容琴瑟和谐。在此次讲座中，祁小春教授并非以赏析《十七帖》的书法艺术为重点，而是将其作为一件传世文献加以探讨研究。

在进入《十七帖》的主题之前，祁

小春教授展示了几件王羲之尺牍书信的唐人摹本。《丧乱帖》中，有的字并未使用草书笔法，或为草稿；《七月一日帖》草书之流美，后人多以为范本；《快雪时晴帖》被乾隆誉为“三希”之首，惜有阙文；《奉橘帖》中，“多”字最后一笔增添回环，展现出王羲之的笔癖；《初月帖》或有言之为王羲之于马上所写。

回到传世的馆本《十七帖》，现帖文完整的明末祁豸佳旧藏本，即现藏日本的三井本。祁小春教授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十七帖》是如何出现的。《十七帖》作为王羲之的一批草书尺牍，无论内容还是书法，都被认为是由来有绪、最为可靠的法帖。唐张彦远《右军书记》对《十七帖》有详细著录：“《十七帖》

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祁小春教授指出，《十七帖》诸帖来源未必皆出一家所藏，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其最初献自何人或出自某家。所以《十七帖》可能应来自于唐初的大规模征购或四方进献，后又经过褚遂良等“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加以整编而成。当然，《十七帖》中寄周抚的一组书简源出一家之藏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寄郗愔等人的书简则可能出于他藏，后以书迹风格相近故，遂“以类相从”而被编进《十七帖》也未可知。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一——《十七帖》是寄给谁的书信。据宋黄伯思的说法，因为《十七帖》重点



内容以“问蜀事为多”，故这些内容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即给周抚的书信。其中，《七十帖》、《蜀都帖》、《儿女帖》都是有关计划游蜀的书信，其内容反映了王羲之想趁周抚尚在蜀任期间，尽早促成此行，其急不可待的心情溢于纸面。而除此之外的书简，尚无法确认究竟寄给何人。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十七帖》的版本系统。祁小春教授指出，以书迹形式传世的《十七帖》有三个系统：一是传南唐李煜得唐贺知章临本置于“澄心堂”，并刻以传世，称贺监本，今已佚，故标榜“贺监本”的一般被认为是伪作；二是唐人临摹本，有传世的和敦煌所出唐人临本；三是末尾有勅押和唐褚遂良跋尾刻本，称馆本（或勅字本），传世拓本最早亦为唐以后物。传世馆本亦有七个流传系统，其中三井本最佳，全二十九帖不阙，是完整且纸无损坏的唯一本子。随后，祁小春教授将《十七帖》从开篇的《郗司马帖》到最末的《虞安吉帖》及最后的跋尾完整展示了一遍。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馆本《十七帖》成立的时间。学界对此看法不一，较为权威的意见认为，应在五代南唐李后主时代（937—975）。周笃文先生指出，敦煌唐人临本《瞻近帖》与《龙保帖》二帖临在一处，正好与《右军书记》第三、四帖的次序相符，这说明敦煌写本《瞻近帖》、《龙保帖》乃早于馆本，并且未必晚于《右军书记》本。馆本在帖数上多于《右军

书记》本，在排列顺序上又与《右军书记》、唐临本不同，而在时间上均晚于后二者，所以馆本二十九帖恐怕已非《十七帖》原有的形式了。

祁小春教授讨论的第五个问题是——馆本《十七帖》是否完整。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后”条云：“予尝见毕文将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华’一种。……然余案今诸本并无此一种，而《法书要录》十七帖亦不载此，不知何缘毕氏本有之？但未尝见此帖，无从知其真伪。姑记于此，以俟后观云。”如果黄伯思所言唐初摹本说法可信，则可以确定《来禽帖》有脱阙。由此可见，今本《十七帖》应该已非最初形态。

第六个问题是——褚遂良是否“编整”过《十七帖》，这也是祁小春教授本次讲座中最重要的话题。魏晋人书信尺牍一般都有专门的书式语词，其程序为“月日名白……姓名白”，此为尺牍常见书式。但《十七帖》中二十九帖竟无一帖署有日期姓名。祁小春教授认为，现存馆本《十七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羲之尺牍的面貌，但并不是其最初的原始形状。馆本、《右军书记》本与“贞观中内本”都存在阙“月日名白”的相似点，因而可推定均非出自《十七帖》真迹本，很可能是来自于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某一流传系统。

张彦远在《右军书记》卷首的题词中，对《十七帖》有详细的描述，从其所描述的豪华装裱形式，应是真迹本才有的

待遇，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通过文献学考证手段可以确定，馆本与《右军书记》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前者虽晚出，已非后者原有形式（帖数、顺序不同），但正因为有张彦远“贞观中内本”的记述，才证明其中至少二十三帖必出自《右军书记》帖。祁小春教授指出，官本是王羲之的书迹无误，学习书法之人可以放心以此为范本；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是不是真迹还需考证。

其次，对于《十七帖》之未款“月日名白”，祁小春教授有专文《〈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讨论这个问题，指出在某些场合下，尺牍可省略“月日名白”。第一，若书信不日就能送达，则可能省略日期；第二，有时书信使用二纸复书形式，日期写于上纸，而只有未写日期的下纸得以流传；此外，《十七帖》中除“月日名白”之外的帖文，似亦有删节。

如果说《十七帖》可能被人改动，则最有可能是褚遂良出于编草书教材的目的。《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记载：“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由此可见，褚遂良在当时的朝廷之上可谓王书辨伪之权威。也就是说，为了编辑一部草书教材，褚遂良可能从内府中选择出《十七帖》并做了相应的编整，可能包括：删“月日名白”或部分正文语词，以统一形式；所选皆为草书风格相近相似的书简，以统一书风；对原帖字迹略加改动，以便临摹辨识。

那么，张彦远所见“贞观中内本”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本？一种推测是，张彦远《书记》题词所记录的“贞观中内本”或为一个集摹本，而张误认作贞观内府装池的真迹本；也有人认为，从张家家藏的聚散经历来看，张彦远或许并未见过“贞观中内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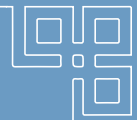
最后，祁小春教授总结称，馆本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一些原尺牍的面貌，但并不完整，现状非其原始形状。馆本与《书记》本和“贞观中内本”都具某些相似性，故可推测这些均属出同源，但非出自《十七帖》的真迹本系统，而很可能源自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被用来作草书教材的《十七帖》系统。主持人王一川教授最后指出，书法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研究者要注重考据，注重其艺术性背后的语言、文学、文化背景的考辨。讲座结束之后，到场的著名书法家李双阳即兴挥毫，现场临摹了几行王草。伴随着现场师生的热烈掌声，本次雅集活动落下了帷幕。

（撰稿：施朝）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  
主题研讨会





## （一）“中华文明与世界”主题研讨会纪要



与会人员聚精会神地听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发言

2016年9月21日上午9点30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第一场在静园四院201室如期举行。研讨会以“中华文明与世界”为主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召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为主要发言人，来自校内外各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作了精彩发言，热烈参与了讨论。

葛兆光教授首先致辞，他发言的主题为“中国文化理解与研究中的难题”。他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指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中遇到的几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中国文化的界定之难。自从晚清以来，关于文化的讨论一直非常抽象。同时，我们对西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是非常模

糊的。第二个难题，我们讲的中国文化，仍然是汉族文化。经过蒙元、满清，中国变成了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不能仅仅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如今多元一体的中国，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葛教授承认多元，但认为一体有待商榷。第三个难题，是中国文化史书写的困惑。我们现在所有的中国文化史都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分门别类，比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另外一种是按时间来，然而还是在每个时间段内分门别类。文化史要有一个主轴，一个目标。葛兆光教授认为《法国文化史》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轴、路标，即法国是怎样形成的，在古代欧洲的一个地方，逐渐形成有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这个过程。这一点在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应该借鉴。大尺度用西方作为背景，

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象征，并非中国文化史本来面目。

接着，钱乘旦教授作了“文明多样性与文明的回归”的主题发言。他先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开始，以大量史实介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和进程，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个永恒的主题。最远古的文明都出现在大河旁边，如两河流域、黄河流域。河是古代人类交通最为便捷的通道。不仅是河边，海边也可以出现人类文明，比如欧洲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钱乘旦教授指出水作为沟通渠道对于文明产生的重要性。接下来，他着重阐述了古希腊文明的两个特点：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两种制度是固化的，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并被认为是具有“普世价值”，但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文明恰恰在这两点上发生了偏移，从城邦变成庞大的帝国。罗马八百年的历史里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却没有民主制度。钱乘旦教授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如现在所谓的“普世主义者”所言是按照一个既定模式发展的。

除了希腊文明，钱乘旦教授还举了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多地文明来解释从远古到现在，人类文明一直呈现多样化发展。在这种文明背景下，钱乘旦教授讲到了中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整体而言都处在大一统的局面，这种局面是让汉文化地区社会得以长期稳定、并在中世纪远远超过西欧的基本因素之一。文明需要载体，包括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是大一统局面加孔子学说，这两者的结合可以说非常

完美。因此中华文明的特点不在于出现的时间早，而在于延续的时间长。中世纪的破碎与混乱，让西方率先崛起，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便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哪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化模式也是各有不同，甚至同一个国家之内也不断转换自己的制度，说明了一个国家里也存在文明多样性。钱乘旦教授总结说，只承认文明单一性，不承认多样性是不对的。

介绍了文明多样性，钱乘旦教授提出了文明回归的概念。他不赞成文明冲突的说法，文明的多样性不一定非要靠战争来解决。文明回归便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西方的办法解决，而应该回归自己的古老文明。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对两位主讲人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集中讨论了关于中华文明、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等一系列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认同中华民族是多元的，但是不是一体还不很确定。特别是经历了蒙元和满清之后，中国文化本身确实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这样的一个一体格局当中，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一直是有有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差异中，展现出格局的差异性，把异质的东西统一到一起。吴飞教授同时认为，钱乘旦教授不断强调历史学科注重史实，这和哲学不同。今天所说的西方普世价值，是经过了许多现代的重新诠释和建构之后的自由民主精神。它不是一个事实角度，而是作为一个理论可用

到世界各个文明当中。不同国家通过具体的路径，最后都是达到了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现代的结果。

对此，葛兆光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葛兆光教授谈到，多元一体问题是费孝通教授1990年提出的观点。他不赞成多元一体说法，因为它是倒着说的，是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过来谈中国历史。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列举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认为文明不是普世的，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强势规则。边缘常常被中心的强势文明被压迫，无论是好是坏，文明只能说它在边缘。钱乘旦教授认为“文化”与“文明”确实难于区分，历史总是不断在进步，最终有尽头的单线思维只是人类种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西方把普世价值强行推行到全人类的思维上，也只是一种推想，未必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就文化多元一体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宏教授认为，近些年来，学界谈论中国国家问题，这是一种集体焦虑。他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思维还有天朝上国式的考虑，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我们的多元一体都在一个井里面，比如我们的博物馆没有以外国文物为主题的展览。许宏教授认为，按照考古学本位的说法，划分中国上古史：第一个是无中心的多元，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到二里头，才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前后是一个大的分野。中国考古学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已经开始从

民族主义考古学转型到世界的考古学。三代考古学，从证经补史的考古学转型为全方位的学科。至于这种转型，要引发明进一步思考。

韩建业教授认为文明多元一体是一个辩证的、哲学的问题。对于约四万年前仿佛一夜之间出现的刻画符号、壁画、墓葬、装饰品等，他认为文明更多的还是一体。韩建业教授还强调，在当今人工智能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人与自然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秦立彦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春高教授则对中国文明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和看法。秦立彦教授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儒学、三教合一等传统文化淡化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继续使用“中国文化”这一概念的问题；黄春高教授则给出了不同文明一定有一个一致性的观点。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结合前面几位学者和自身研究经历提出了当代中国需要对古典文明做出回响的观点。袁明教授特别指出，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在今年系毕业典礼上与学生一起背诵《前赤壁赋》的例子，便是对古典文明一种很好的回响。与会学者热烈讨论，对两位主讲人的主题报告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钱乘旦教授对此做了一个小结，他强调，文明是多元还是一体是一个问题的正反面，不同时代下应该强调不同的侧面。以自己国家的文化看待世界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避免以自我为中心，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文化。

最后，召集人孙庆伟教授作了总结发

言。孙庆伟教授认为大家对理解什么是中国，差别很大。晋南一定是最早中国的地理正统，后来移到了河南。二里头不会是最早的夏。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变量。历史有很多偶然性，不会按照上帝设定的方向去发展的。钱乘旦教授的发言更强调中

国学者是敢于认识世界的。两位老师代表当今人文学界最顶尖的两位学者，是中国学术界自信的体现，既有勇气去怀疑自己，也敢于去认识世界。

(本文由曾静蕾、李灵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 (二) “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主题研讨会纪要

9月21日上午，“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主题研讨在静园四院召开。本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的第二场主题研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受邀担任主题研讨的主讲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研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程苏东参与研讨，并与陈来、陈平原两位主讲人展开交流。

陆扬老师首先简单说明了组织这场主题研讨的缘由：一方面是庆祝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借此机会组织一场有深度、开放性的座谈会；另一方面是邀请不同学科的人文社科代表性学者一起讨论有深度的课题，并为文研院今后的发展，以及各学科之间的对话提供一些指导。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主讲人陈来教授首先强调了一个论点——人文精神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写的王国维碑铭中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种大学的学术精神，而非社会的、政治的或是其他方面的追求。在这里，独立自由是相对于“俗谛”而言的。“俗谛”这两个字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常用，指世俗的、既有的一种成见，这在陈寅恪看来是妨碍对真理的探求的。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时代就为北大奠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奇生发言

的精神，今日依然是北大推崇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更广义地看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也应承认自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之一。

陈来教授说，一般大众对人文学的认识，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环境市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这正是当代人文主义精神着力反对的。当下中国大学人文学问题的根源，是技术理性与官僚系统的双重宰制。目前的大学文科评价体系高度量化，研究成果空洞化，研究成果不论学科一律推崇以英文发表，这些管理措施构成了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障碍。这种数量指标的评价体系，就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宰制。在技术理性思维的宰制下，出现了只崇尚发展技术分析，忽视思想，缺少文化意识，没有人文精神，脱离中华文化的人文传统的学术倾向。

随后，陈来教授从康德哲学的自由观谈到儒学的自由观，提出儒学始终追求对道德自由的深化，例如陆象山所讲的“自

作主宰”。儒学所肯定的这个境界，毫无疑问也是摆脱感性因果性的自由境界。发扬人文精神，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人文道德传统，这是社会转型期伦理重建的根本。

最后，陈来教授作了简单的小结。陈来教授的核心命题是，人文精神就是“独立自由的精神”，而作为学术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既定成见的自由；作为教育方向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技术理性的自由；作为道德精神的独立自由，就是独立于感性世界必然的自由。

陈平原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首先，陈平原教授谈了“学在民间”的问题。1906年，当科举制度废除的时候，当初批判它的章太炎就怀疑道，中国的学术“自上建之则日衰，自下倡之则益善”。这使得章太炎一辈子坚持私学传统，拒绝参加这些官办的教学机构，坚持一辈子的个人讲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4年。再到后来，独立讲学作为

一种制度基本上无法坚持下来，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却值得我们追怀。

陈平原教授说，晚清东西方文化碰撞及学制转型过程中，最初引进学校是为了抛弃科举，但我们抛弃科举的时候，连书院也抛弃了，而书院基本上以私立为主。私人讲学从孔孟时期一直走到了晚清；而书院自戊戌变法之后，一直走下坡路。胡适在当时为北大、清华的学校设计中特别强调，将传统中国书院以及西洋研究所相结合。再到后来，更直接地走出现代大学的窠臼、努力延续传统的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他们做了若干尝试，但都失败了。总之，晚清以后我们很好地借鉴了西洋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基本丢弃了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在某些人、某些枝节上有所保留，但整体上已经不再可能了。

陈平原教授特别提到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学校。表面上，二者的章程不太一样，北京大学强调德国、美国的制度，清华强调传统中国的书院精神。但二者背后的理路是一样的，原因是北大是从国子监走出来的，希望更多与西洋接轨；而清华当时遭受最多的批评就是所谓“美国留学预备学校”，所以希望与传统的接轨。两个学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都希望把西洋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结合起来。

随后，陈平原教授谈论了人文学在最近三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所面对的困境。近三十年来，第一个十年即80年代，那是人文学的黄金时代，社会科学处于恢复性增长的阶段；第二个十年即90年代，社会科学迅速兴起，人文科学内外交困，因政治突变、经济大潮而进入了最低潮，

北京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甚至不足出租车司机的八分之一；第三个十年，社会科学占压倒性的优势，但人文科学被日渐边缘化。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注重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这是陈平原教授1993年的论述。2007年，他在《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又说，1993到2007这15年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一番积极的扶持，“大学里的人文学者，钱多了，气顺了，路也好走了；但是原先强调的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逐渐变得日渐平淡、僵硬、了无趣味”。这也是陈平原教授感到可惜的地方。他还说，想象中的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辅助现实决策，这本是科学学的思路，可在今天，人文学也得走这条路了。这对于人文学来说，压抑了个人化的思考和表达。陈平原教授还特别指出，现在大学中流行的“智库”方法，很容易把人文学的根底掏空。

陈平原教授说，所谓“学在民间”，如今只是一种精神和理念，而制度的建设非常困难。当今中国的私学根基不稳，虚体难以为继，不具备支持私学的强大传统。陈平原教授近年来特别关注私立大学，数量虽多（700多所），但缺乏制度性的支持：政府虽允许开办，但银行不许贷款，政府不给拨款，因而只能靠学费支持。陈平原教授指出，“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汤一介先生，包括我们这些小喽啰，我们

是特别希望办私立大学的”，但这又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最后，陈平原教授指出，“挣扎、徘徊、游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这是他的“自我定位”。

主持人陆扬对两人的发言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后，参与座谈的几位嘉宾就主讲人的发言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经济学院的张亚光老师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从历史的情况看，人文精神的发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正反馈调节机制，很多情况下甚至相反。因此，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是必然的，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答案。

历史学系的王奇生教授认为，近年来，大众对许多民国学者颇有神话化的趋势。此外，对于一些重要时间节点的问题，王奇生教授认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919年的“三二”——共产国际成立；相对于此，1949年和1978年两个时间点的转折意义都不是最重要的。

中文系的王风教授认为，对现代社会的中国来说，五四路线是一个刚性的思路、选择，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到了另一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这些文化感情冲突问题，主要来源于缺失传统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历史资源的有效吸收，很大程度上是审美的放荡。王风教授希望文研院能够成为一个不同学科学者之间沟通的平台，实现学科之间的汇通。

社科院历史所的孟彦弘研究员认为，

教育部应当增加对私立学校提供的资源，减少私立学校的种种限制，使今天的私立学校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中文系青年学者程苏东老师提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由盛而衰的经历，又提到汉武帝时期不满只能做一个本分的“显学”知识人的东方朔。程苏东说，现实之中，国家已经有权力掌控各种事物，我们在一所国立大学又重新提起“人文精神”，本身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认为，有一个观点在论学方面特别重要——“争鸣”。空洞的独立自由没有意义，独立自由是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独立自由。对建制的问题而言，其实从读书、真理的角度来讲，没有哪个建制是能够积极推进探索真理的。所谓“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精神，正是现在治学、思想的真理。

陈平原教授总结说，我们每个人的学科背景，决定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这个方法是可贵的，经济、历史、中文、哲学都有各自的偏见、各自的立场。而所谓跨学科，是在自己学科的立场上，理解其他学科产生自己思考的过程。而现在有些研究跨学科领域的人，是靠打倒别人来证明自己，陈平原教授表示，对这些人，他是“非常不以为然”的。

最后，在现场旁听师生热烈的掌声之后，主持人陆扬再次感谢了主讲人、各位嘉宾和各位旁听者的到来。

(本文由施朝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 (三) “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主题研讨会纪要

2016年9月21日上午9点30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第三场在静园二院208室如期举行。研讨会以“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为主题，台湾中研院黄进兴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为主要发言人，他们的精彩演讲引发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历史学系叶炜副教授召集的、分别来自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的各位专家学者的热烈讨论。

黄进兴院士首先发言，他先以自己所处的学术环境——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为例，介绍了存在于史语所中的“学术传统”。史语所自1928年成立以来，迅速成长为当时北方历史学的重镇，这与具有强烈个人风格与魅力的傅斯年的领导密切相关。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时，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而兰克学派的研究方法，也成了史语所安身立命之本。当然，若我们仅仅将之概括以“史科学的方法”，未免有失偏颇，不但误解了史语所，也误解了傅斯年，但对实证材料的重视是史语所自成立至今一直延续的一种传统。史语所在1970年代以后引进来自各地的研究人才，虽然他们的学说观点、研究方法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所有人都无法逃脱对基本材料的重视。因此，史语所虽然与最初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中的变化(change within tradition)。

随后，黄先生又以他所治的思想史领

域内的发展为例，谈到了“范式转移”。实际上，范式转移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范式有一个很核心的特征，即“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即范式和范式之间不能互补。似乎范式变迁常常被认为是超出学术传统的，这一点可能值得商榷。以思想史的发展为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有两个最关键的人，余英时先生和林毓生先生。林先生的“分析式思想史”影响很大，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internal approach)更具声名。后来的历史学、哲学乃至文学，即使意识上有所出入，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余先生的理路。因此，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是有所改变的。但变化的速度和繁复程度，仍然不及西方。西方思想至少有六次转变，华文世界有的跟上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



了，有的没有跟上。跟上不一定好，新的也不一定好，因为方法或者方法论都有自己的语境，西方的不一定契合华文世界的议题。

在以前的研究中，范式的变化基本上都是补充传统中思想史的不足，或者是没有看到的東西，直到后现代以后，这个态度就完全变了。它认为你做的根本不是思想史，甚至根本不是历史。他们说“西方的史学基本上就是一个神话学”，本来学术传统和学术范式的变迁是可分可合的，但后现代以后，就变成截然对立的了。

荣新江教授紧接着回顾了北大与史语所的一段渊源：解放前的北大和史语所，在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后来邓广铭先生建立古代史研究中心，基本上仿照史语所的理念，一个院落的老师、学生、书籍都在一起，有很多交流，这其实也是傅斯年先生从欧洲的学院制学来的。但是学术传统很容易出现中断的情况。比如北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很多传统就发生了变化。史语所可能一直延续着傅斯年的传统，但也经历了一些机构的变迁（如语言学研究所的独立）。他所从事的中外关系史领域，因为受到政治的影响，也经历了学术传统的变革。

荣教授认为，还是应当坚持过去史语所重视史料的传统，从史料出发，去归纳理论，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理论。随后荣教授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的可能性，有很多史料是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方法去处理的。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分别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关于学

术传统、研究范式和两个学科关系等一系列议题。

应星教授认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其实差别很大，反映在研究方法、学科气质等各方面。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正处在建立范式、建立传统的时候，旧有的传统例如费孝通、潘光旦、瞿同祖等各位先生的理念和观点在当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当前对社会学的一般印象，是定量研究和各种技术化的方法。但其实在古典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和历史学有紧密的联系，当前社会学界应该努力的，是重新呈现社会学应有的历史厚度，但真正的交叉融合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王天夫教授则指出，社会学所普遍采用的技术方法虽然对研究个体和行为很有用，但对解释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变迁来说就非常软弱无力。回归历史对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冯仕政教授也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希望达到“科学”的程度，精细的历史学可以帮助社会学看到复杂的现实状况，令社会学家们真正去思考理论和模型的优点和局限。社会学和历史学在精神上“神交已久”，但在组织形态上如何合作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赵世瑜教授指出，在更长的时段中历史学研究从经学传统到当代传统的转变，同时也指出，虽然历史学并非十分强调范式的创新和转移，但也在不经意间经历了这个过程。他还以费孝通和吴晗的合作（《皇权与绅权》）作为两个学科合作的范例。侯旭东教授紧接着赵教授的发言，谈到两门学科的合作可能性应当注意建构

上的设置，因为《皇权与绅权》本身就是费、吴二位先生合开课程的产物。同时他也认为社会学的视角对历史学研究很有助益，即使在更久远的历史时段中，历史学家也可以和社会学家有一些共享的话题。罗新教授具体说明了历史学研究中的范式转变：“史学就是史料学”确立了现代历史学的地位；当前的“史料学就是史学”则扩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刘后滨教授分析了范式转移的机制：科普的作用和代际的差异都有可能成为范式转换的原因。

最后，召集人周飞舟教授作总结发言：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是实证的学说，是可以相互补益的，但可能与学科内的理论传统有关，两者又有明显的分野。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一个事件、一个现象的理解，只从结构的视角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特有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对个人行动有极强的塑造作用，因此真正的理解，必须回到历史中去。

（本文由秦鹏飞、左雯敏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 （四）“西学在中国”主题研讨会纪要

2016年9月21日上午9点30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会第四场在静园二院211室如期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北京大学英语系高峰枫教授两位召集人为此次研讨会邀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大学英语系刘锋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沛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隆国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与会的九位发言人在“西学在中国”的主题下，深入探讨了西学的概念、西学研究心态的变迁、西学研究的根本立场、西学如何成为“为己之学”等议题。各位嘉宾你来我往，妙语连珠，现场气氛热烈。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

召集人李猛教授在引言中开篇点题，强调“西学在中国”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学术的焦点议题，无论是研究中国，还是研究世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国语境下研究“西学在中国”这个议题，目的究竟是什么？怎样使西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中国的西学研究作为研究的意涵在哪里？

刘北成教授首先从“西学”概念引发的困惑出发，追溯了学问上中西之分的起源。他认为在从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梁启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转变中，中西之分代替了新旧之分，新学/西学乘着西方称霸的历史大潮在制度上取得了胜利。刘老师紧接着质疑了西学与东方学之间的对立，转而强调西学和中学、国学和西方古典学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他将“西学”概念定义为对整个西方学术的概括。不过，他并不将这两组对立视作不言自明，在提到当今的国学复兴时，他提示我们应当反思西方古典学能否作为参照物来处理中国的学问。他进而又拷问了中西问题的实际意义：当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框架、基本概念都是西方舶来品的时候，谈西学还合适吗？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强调中西之分。国家、学界倡导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便是执着于中西之分。相反，刘北成老师的愿景是没有隔阂的学术，不以族群的身份划分和命名的学术。不过这一愿望是否随着全球化而逐步接近现实呢？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当今全球化不仅在造成交流、达成一致，也在放大分歧，使中学/西学、东方/西方之间的隔阂重现。但是，当掌握多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

种语言的年轻人们在中西界限两边自由穿行的时候，不按身份划分学术的梦想是不是就会实现，是不是“西学”就不再存在了？他以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结束了发言。

第二位发言的李强教授则给出了一个更具有历史现实色彩的“西学”定义，他认为西学，包括他所从事的西方政治学，指的是中国人看待西方道路、模式等文明核心的方式。他认为近代以来，这种认知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迁。明末传教士进入中国，激起中国人接触西学的第一个大浪潮。经他调查，“自由(liberty)”一词正是在这一阶段被引入汉语。中国人第二轮大规模地接触、介绍西学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儒家文化历来蕴含着政治理想和政治手段不足之间的张力，而此时出现的西学则被魏源、郑观应等人视为实现“三代理想”的新途径。第三个阶段则见证了中西之争转变为新旧之争、古今

之争，它起始于严复的《天演论》。李强教授认为严复译介的进化论为洋务派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扭转了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这场辩论的格局。

一战以后，对西方处于文明高级阶段的定位和道德化的塑造受到了动摇，但是先进知识分子们仍循着进化论的思想轨迹，认为认清世界发展方向、找到超越的、在进化论最顶端的模式才是当务之急。强者逻辑、历史发展的直线型也都是缘起于进化论思想。那么话说回来，这段认知态度的变迁史能为我们照亮哪些得失，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面对西方？李强教授认为，一方面应警惕把某一共同体的逻辑夸大为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群体又都有义务反思普世人性，追求超越简单价值评判的、符合人类生存境况的路径。如此方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

李猛教授在回复中对李强教授的视角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强教授从谁能够接近普遍秩序的角度来理解中西关系，实际上突破了最初新学的强者逻辑，回到西方对普遍性、超越性的诉求。

刘锋教授第四个发言，分享了他在之前几轮发言中得到的启发。他认为在西学概念上达成共识很困难，不如另辟蹊径，回到原点来定义西学，明确在中国研究西学的目的。他特别举了著名外国文学研究者、已故的北大英语系杨周翰先生的例子。杨先生认为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不是为外国添砖加瓦，而是为我们自己的学术服务。往前追溯，外国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吴宓先生也所见略同。他对外国文学教学研究有清醒的定位：一定要引入中西

比较的视野，汲取西方文明精华，以西方为一种超越本土的参照，来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他的研究立场是“以我为主”的。五四运动后，致力于引入西方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他们选择性地引介能给中国文学革新提供参照的思潮。最后，刘锋老师还强调，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学思潮大大深入，九十年代后又逐渐向学术研究靠拢，中国人研究西学的定位问题却缺乏关注，而究竟为什么研究西学、怎样研究西学，都是非常关键、不容忽视的问题。

张沛教授顺着前面几位嘉宾开辟的讨论路径，为大家带来了一段文采斐然的即兴演讲。他首先分析了中国文明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焦虑。在一个被西学归化过的学术环境中探讨西学的定位，也许是当前中国精神所在的一种操心 and 筹划，面对一个强大的他者，我们多多少少心怀忧患。作为国学的同位素、姊妹单位的西学，其实是一种为己之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是为中国文明的自我定位服务的，这在中国近代史之初便是如此。因此，我们理解西学还是应当关注其对重建人文中国而言最具有他者效应的核心。最后，他提醒道，如今我们所谈的西学很可能还是进化论意义上的古今之争的一个中国变体，我们早已是这种直线上升、终结于永恒秩序的历史图景的受害者。今天理应回到西学，回望过去的“为己之学”的标准，在历史中实现内在的超越，这才是“西学在中国”的要义。

李猛教授接着张沛教授的发言问道：我们目前的学问在什么意义上是为己之学



呢？一方面，比如中国的考古学，虽然在学科的建设上借鉴了西方考古学的标准方法，但其学科发展和问题意识，却通过传世文献的中介与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学科特点使中国考古学具有其独特的面貌。西方学术模式的广泛借鉴并没有完全取消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学、社会学等社科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已经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西方影响，因此研究这些问题时援引西方的概念和方法，有时具有自然的亲和性。不过，正如刘锋、张沛两位老师提到的，西学的发展要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成为为己之学，重要的是要使西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思想脉络中生根，有自身的生命力，具有自我革新的活力，并能让西学起到催化中国自己思想的作用。

随后发言的先刚教授起首就质疑了用“西学”的统一概念涵盖内部分歧巨大的西方文明是否合适。他指出西学的古代、近现代、后现代三个阶段之间分歧巨大，英法德俄几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区别更不可抹杀。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借鉴西学”或“排斥西学”。中华文明也面临类似的历史困境，儒释道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不亚于西方的情况。然而，把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秩序的近现代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遇：两套非常有生命力的体系在中国交汇、交锋，而且由于我们独特的历史境遇，这只能在中国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继承了西方求知的核心精神，努力去理解西方文明最根本的问题。先刚老师最后指出，

中国研究西学不应该迎合某一时代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利用自身特有的历史际遇，借鉴西方文明中超越性和体系性的思想因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

李隆国教授提出了西学研究的两个读者群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李老师以自己的欧洲中古史领域为例，说明了西学研究在融合国外专业同行和国内大众读者群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对于要在国际学术圈一争高下的学科来说，懂外语、掌握原始资料、做极其细致而专业化的研究、在外国杂志发表成果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不过令人颇为震动的是，他的老师马克垚先生却以迥异于后辈国际化学者的模式，成为矗立国际史坛的一家。另一方面，面对中国读者则又必须妥协于他们的知识结构，把文章通俗化，以获得群众基础、培养后来者。如何调节、融合这两个读者群就是西学在中国最大的挑战。对此，高峰枫老师提供了“两幅面孔”的解决办法：对外国同行不妨以专业姿态写论文，对国内读者则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若不能适应这种角色转换，也就是所谓的“一仆不能事二主”，便只能牺牲其中一方。李猛老师则从李隆国老师的问题出发，质疑是否西学在中国只能是这样一种简介的形式。他指出，如果汉语的西学，只是做二手手引介西方顶尖学者的成果，这样的工作很难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更谈不上真正的思想。而且，如果将西学等同于国际化，研究的学术定位完全追随西方的问题意识，以能否为西方学术界承认为标准，会使许多西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研究西方核心文明传统与重大思想问题的基础学科领

域，难以形成基于自身问题的理论，而更多不过把中国作为借以应用或检验西方某个时兴理论的田野或实验室。李强老师在这点上与李猛老师产生了共鸣。他发现国内政治学领域的一些研究者们为了在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某些琐碎命题趋之若鹜。西方学术界是在已经解决了一些大的建制问题，方才转向精细化研究，而我们却本末倒置，忽略了我们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是学术方向的大失误。

对读者群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后，孙飞宇教授回过头来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意识。他以严复先生在中国引介社会学和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理想为例，说明了“为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最初引入社会学就已奠定的基调。社会学这门西学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够扎根到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问题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最本土的研究反而是最具普遍意义的，最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社会学一开始就应该是“做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学问”。不过，社会学在今天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尤其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的问题。“两种读者群”或者说国际发表的问题实际上会给“为己”之学带来挑战。此外，如果在社会学研究中只强调技术和科学，而忽略意义的问题，那么中西之争就可能降落到一个纯粹技术的角度，而技术本身会很快淹没中

西之争里的大问题。最后，无论以何种名称命名，也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理论还是现实，今天我们对于中国自己的学问和他者学问的理解和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最需要的态度是踏踏实实地做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谈立场、态度都是危险的做法，不是学问。

高峰枫教授也表达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他一方面认可“学术没有国家队”的说法，另一方面却也认同学术应有自己的关怀，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他建议根据学科做出区分，对例如历史考据类的研究，“学术没有国家队”更能成立，而对于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则不能完全没有一定的关怀。不过，他建议年轻学生们先从更纯粹、负担更轻的个人情怀出发进入西学，深入之后再去看是否能与现实产生关联。若能在纯粹求知的层面上把学术做好，同样是了不起的成就。西学概念应该少些苦大仇深的味道，接触西学应少点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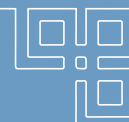
高峰枫教授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们又就“中国的西方”和“西方的西方”的差异、认识西方的心态变迁等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本次专题研讨会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落下了帷幕。

（本文由谭振洲根据现场录音稿整理）





北大文研院揭牌仪式  
专题展览







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讲解员讲解“数字敦煌”



《胡适与北大》主题展览现场

## 01 《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巡展》

9月10日—10月18日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巡展”于2016年9月10日—2016年10月18日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中厅展出。本次展品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带来，内容包括作为敦煌壁画数字化成果的高保真复制品57幅、莫高窟三窟原大复制洞窟18件、莫高窟藏经洞经卷7件、塑像2身。这些复制品高保真地再现了敦煌石窟的信息，真实地再现了敦煌艺术的神韵。同时，展品内容还原了从魏晋直到元明时期西域的政治、宗教、外交、文化等大量细致生动的历史生活场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宝库。

### 主办单位：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敦煌研究院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 02 《胡适与北大》

9月19日—9月23日 北京大学图书馆东门展厅

为纪念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核心人物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0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于2016年9月19日至23日联合举办“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此次专题展览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的系列活动之一。文研院一向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基本宗旨，这次展览也是文研院整合北大综合优势，凝聚多方学术精华的用心之作，力图真实还原并合理呈现胡适生活和思想的点滴细节。正如此次展览入口处胡适手书徐志摩《猛虎集》中的两句诗中所写：“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胡适个人丰富的生命历程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必将为北大学子带来更加多元的思维向度，也将为社会各界人士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思想空间。

### 主办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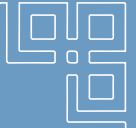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图书馆

### 鸣谢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台湾中研院胡适纪念馆



## 文研纪事







## 文研纪事

05

2016-05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首次筹备恳谈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主持，林建华校长、王博校长助理等校领导，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校内外学者参加了会议，如陈来、李零、刘北成、俞可平、朱青生、彭刚、王铭铭、何怀宏、彭小瑜、罗新等。各位学者畅谈对文研院的期望，也对文研院的揭牌仪式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与会者还深入讨论了建设国内高等研究院体制机制的建设、建立跨学科平台、发挥北大学术话语权等议题。

05

2016-05

林建华校长于静园二院会见新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校长助理王博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陪同，参与座谈。

09

2016-05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首次工作委员会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主持，参会人员有邓小南、王博、高峰枫、陆扬、李猛、周飞舟、孙庆伟、邢滔滔、张辉、叶炜、王周谊、李净等。工作委员会成员就文研院筹备事宜及具体工作安排展开了讨论，提出了多项切实的建议。

12

2016-05

渠敬东教授、王铭铭教授邀请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 (David Parkin) 前来参观文研院。渠教授介绍了文研院即将开展的工作及各类学术活动，并诚挚欢迎大卫·帕金 (David Parkin) 教授未来莅临文研院进行学术交流。

19

2016-05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二次筹备恳谈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北京大学各院系代表学者如陈平原、赵敦华、赵辉、王奇生、平新乔、刘云杉，以及国内各大高校机构代表如社科院文学所刘宁、中国艺术研究院梁治平、浙江大学朱天飏、厦门大学郑振满、中山大学刘志伟等。各位与会者围绕文研院现阶段建设及跨学科的长远发展进行了讨论，并汲取当今各家高研院之所长，结合北大自身特点，给予了诸多具体的建议。

23

2016-05

渠敬东教授邀请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之女潘乃谷教授，及潘光旦先生的外孙潘成老师前来文研院，商议举办纪念潘光旦先生展览相关物件及诸事宜。

02

2016-06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会会议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主持，参会人员有邓小南、高峰枫、周飞舟、孙庆伟、邢滔滔、张辉、叶炜、张亚光、李净等。工作委员就文研院章程及秋季学期学术研讨计划进行了讨论。

07

2016-06

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教育家林耀华先生生前所用书柜，由其子林宗成先生从蓝旗营家中运送到文研院珍藏。

09

2016-06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讲座教授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来访，文研院于静园二院举行“时间与空间：历史研究方法”座谈会。周锡瑞教授主要从时间、空间的维度，就史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及对近来研究作了介绍。王奇生、唐晓峰、韩茂莉、欧阳哲生、牛大勇、赵世瑜、应星、张静、邓小南、渠敬东等参与座谈，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参与了探讨。

10

2016-06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三次筹备恳谈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邓小南教授主持，林建华校长作了重要讲话。校长助理王博教授，及李强、袁明、朱苏力、阎步克、谢宇、荣新江、张鸣、朱良志、张旭东等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各位学者畅谈对文研院的期望，并结合本学科对文研院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16

2016-06

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方志伟老师等来访。渠敬东教授代表北大文研院向兄弟院校高研院代表介绍了我院近期的活动及秋季学期的学术活动计划，并希望两院日后有更多的相互借鉴与交流。

25-26  
2016-06

北京大学哲学系、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北大静园二院联合主办了“霍布斯与现代秩序”学术研讨会。会议分为甲乙两会场同时进行，分别探讨了“霍布斯与古今政治”、“霍布斯的道德世界”、“霍布斯与民主自由”等十个话题。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论文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13  
2016-07

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系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 Bol）先生来访，与王博教授、邓小南教授、渠敬东教授洽谈有关北大文研院学术目标、建设方式以及他个人的访问计划，他特别建议北京大学应推行“数字人文”规划项目。包弼德教授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邓小南教授、图书分馆长史睿馆员、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徐力恒、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项目小组负责人杨光等共同商谈 CBDB 项目继续完善与推广事宜。

21-22  
2016-07

“菊生学术论坛”第一期“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与国家建设跨学科研讨会”暨“中华学术名著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本次学术论坛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场次，主要以中华学术的近代转型为讨论议题，同时探讨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潮；第二场次，以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变迁为前提，讨论了近代中国不同阶段的国家政权建设。

28  
2016-07

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大静园二院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出席了研讨会，并就“艺术家能为乡土重建做些什么？”、“中国乡村社会及现代变迁”等五大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

04  
2016-08

校长助理王博教授、邓小南教授和渠敬东教授向林建华校长汇报文研院近期工作及九月份揭牌仪式的筹备进展，并赴国际合作部与夏红卫部长洽谈长期合作交流等事宜。

7-8  
2016-08

“菊生学术论坛”第二期“西方现代性的诸思想传统跨学科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本次学术论坛分四场，分别以“政治与哲学：西方现代思想的源起”、“英国早期现代的思想传统”、“卢梭与孟德斯鸠：现代思想在 18 世纪法国的开展”、“现代思想在 19 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发展”为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18  
2016-08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宣传片开始拍摄。该宣传片根据北大历史人文精神及北大现今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为主线进行拍摄，并采访人文社科学科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代表，畅谈北大精神、学问之道，指出了对北大人文社科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与责任的展望，以及对北大文研院的期待与建议。

25  
2016-08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

08  
2016-09

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系列活动开启。主讲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教授，同彭金章、荣新江、杭侃、孙庆伟等学者，围绕“敦煌保护研究三十年”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09  
2016-09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尾崎文昭于静园二院主讲“周作人思想的分析试探”。此为“北大文研论坛”第二期。除主讲嘉宾外，与会人员有中文系陈平原、陈晓明、高远东、吴晓东、王风、贺桂梅、蒋洪生、张丽华诸教授及相关领域专家。

10  
2016-09

“千年敦煌——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巡展”于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中厅隆重开幕。此次展览展出了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带来的众多精美莫高窟壁画及文物，勾勒出敦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

13  
2016-09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讲座系列”开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教授为数百名北大学子带来“北大文研讲座”第一期——“敦煌莫高窟及其文化价值”，这场备受关注的演讲确立了“北大文研讲座”系列的高水准。

14  
2016-09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期第一场开讲，由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带来题为“历史的转向：20 世纪晚期人文科学历史意识的再兴”的演讲。

16  
2016-09

“北大文研论坛”第三期“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及其衍生的问题”在二院举办，主讲人黄进兴院士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帆教授、何晋教授、陆扬教授、欧阳哲生教授、叶炜副教授、四川大学张邦炜教授等与会者，就中国传统思想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16  
2016-09

2016-2017 秋季学期文研院邀访教授与邀访学者报到，渠敬东常务副院长与访问教授、访问学者见面。



19

2016-09

为纪念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核心人物胡适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70 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办的“胡适与北大”专题展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东门展厅隆重开幕，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致开幕词。此次展览展出的珍贵历史资料贯穿胡适先生从 1917 年回国进入北大直至 1948 年匆匆离开北平这长达 31 年的时期，多角度呈现了这位文化伟人与北大结下的深厚情缘。

19

2016-09

北大文研院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静园二院 111 室召开，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作了重要讲话。参会人员有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王博、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以及文研院学术委员蔡洪滨、陈平原、葛兆光（复旦大学）、黄进兴（台湾中研院）、李零、荣新江、王缉思、谢宇、俞可平、赵敦华、朱苏力等。校组织部宣布任命邓小南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渠敬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之后议题主要包括：汇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筹备工作、审议文研院章程、讨论文研院学术发展方向。选举朱苏力教授为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并确定年度学术委员会召集时间。

20

2016-09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校长林建华以及教育部、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和北京大学各单位的领导、嘉宾及中外学者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揭牌仪式。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将致力于为校内、国内及海外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丰富的学术资源以及有效的行政支持，提升北京大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为海内外学术发展做出持续贡献。

当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演讲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三、第四期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举行。芝加哥大学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为广大师生分别带来题为“作为理念的学术和日常工作的学术”和“禹迹九州和早期中国”的演讲，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21

2016-09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会共四场，于北大静园二院、四院同时举行。四场对话分别题为“中华文明与世界”、“人文精神与社会转型”、“学术传统与范式转移”、“西学在中国”，汇聚了来自北大内外人文社科领域的老中青三代数十位杰出学者。

22

2016-09

“北大文研讲座”第五期在北大理科五号楼举行，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夫马进先生为北大师带来了题为“巴县档案中所见的中国清代乡村社会的‘自治’——以乡村‘裁判’为中心”的演讲。

23

2016-09

“北大文研讲座”第二期第二场开讲，由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黄进兴院士带来题为“从普世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兰克史学为分析始点”的演讲。

27

2016-09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兴业全球基金资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系列开启。该系列以促进北大文科基础学科的发展和青年学者的进步为宗旨。讲座首场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易平副教授主讲，演讲题目为“自由的海洋，还是封闭的海洋？——古典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洋秩序”，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为评议人。

10

2016-10

“北大文研论坛”第四期“比较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中心与边缘”在静园二院举行。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主持，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古典学教授裴吉·杜布瓦（Page Dubois）、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波等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皆与会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11

2016-10

“未名学者讲座”第二期在北大二体举行，北大南亚学系梵巴语教研室叶少勇副教授为北大师带来了题为“‘万法皆空’——佛教哲学中‘空观’的起源与沿革”的演讲。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王颂教授为评议人。

12

2016-10

“北大文研论坛”第五期在静园二院举行。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应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同邀请，作题为“比较视角下的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主题演讲，校内外师生二十余人参与了交流讨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孝聪教授主持。

13

2016-10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期第一场在静园二院进行。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坂元弘子女士在“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的性别观”主题下，与北大师分享了她在研究晚清民国文艺界人士对性别问题讨论的心得。

14

2016-10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静园雅集”系列活动第一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作为“静园雅集”活动的开篇，文学与琴学皆通的北大中文系王风教授以“琴史·琴器·琴曲——古琴漫话”为主题展开演讲，为与会师生分享自己在古琴领域的“漫谈”。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坂元弘子教授及王风教授的母亲均莅临了本次雅集。

15

2016-10

恰逢鲁迅先生去世八十周年前夕，“北大文研论坛”第六期——“游离与独在：木山英雄学术思想座谈会”在二院举行，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周作人研究专家木山英雄教授追忆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同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等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讨。

15

2016-10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网站正式上线。

17

2016-10

邓小南院长、渠敬东常务副院长参加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召开的部务会议。会议讨论了文研院与人文学部未来长期合作诸相关事宜。人文学部主任申丹教授，副主任阎步克教授、李四龙教授及人文学部所属八个院系的院（系）领导，出席了此次会议。

17

2016-10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历史学家、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院士来访，与邓小南院长、渠敬东常务副院长、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李零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陆扬教授、叶炜副教授、韩笑，文研院驻访学者魏斌教授，以及历史系王小甫教授、罗新教授畅谈文研院学术发展事宜。

17

2016-10

戈登伍德“《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中译本出版座谈会”暨“美国早期政治思想研讨会”在静园二院 111 会议室召开。此次研讨由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主持。

18

2016-10

“北大文研讲座”第六期第二场——“谈付梓《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岩波新书）之后的省思”在静园二院进行。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坂元弘子女士新著《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代表了日本学界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讲座中，坂元教授介绍了该书的写作过程及其思考，并同与会者进行了深入讨论。

18

2016-10

“未名学者讲座”第三期在二体 B102 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博士为北

20

2016-10

大师带来题为“‘拾遗补艺，整齐百家’：史记的文本重写及其文学性”的演讲。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扬教授为评议人。

学科评估与大学排名暨“双一流”建设研讨会嘉宾莅临静园二院参访并举行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由渠敬东常务副院长主持，来自十所兄弟院校规划处、学科建设办、政研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座谈。渠敬东常务副院长向莅临的各位嘉宾介绍了文研院的基本状况，并就财政安排、人员组织、空间安排、评价标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发展规划等方面回答了兄弟院校嘉宾的提问。各位嘉宾从自身学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对所属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未来发展的设想。在参访文研院的过程中，兄弟院校的嘉宾纷纷肯定北大和文研院的尝试和服务学术的胸怀，对文研院的发展寄予厚望。

22

2016-10

“北大文研论坛”第七期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以“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为主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后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炜，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蓝志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参与讨论，校内外师生近百人参加论坛。

25

2016-10

哈佛大学副教务长、东亚系暨历史系讲座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应邀到访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以及北大相关领域的学者代表，如历史学系主任张帆、副主任晁涛，教授荣新江、罗新、陆扬、党宝海、晁涛，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马戎、王铭铭等，就关心的学术问题与未来合作方向展开交流。

25

2016-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七期“历史之思——面向未来的视角”在静园二院举行。德国当代知名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教授作了题为“Historical Thinking - A Vision for the Future”（历史之思——面向未来的视角）的讲座，文研院首批驻访学者之一、德国图宾根大学汉韩学系助理研究员曹晋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健教授等近三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28-29  
2016-10

北京大学中国—欧洲中心会议、中文系与文研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历史思想的基本范畴以及中国历史的脉动作为同一世界性的历史之一部分”学术座谈会在静园二院 111 举行。会议由北大欧洲中国研究合作中心承办，持续两天。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30  
2016-10

“北大文研讲座”第八期“中西对规范自我伦理善恶的异同”在静园二院 208 举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李弘祺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刘云杉教授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了活动。

31  
2016-10

“北大文研讲座”第九期“被遗忘的调查报告——《一个农村社团家庭》中的故事”在静园二院举行。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教授主讲，历史系王奇生教授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熊远报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杜丽红副研究员等近三十位师生聆听了讲座。

31  
2016-10

“未名学者讲座”第五期“西斯廷的圣母与多拉的神隐——弗洛伊德多拉案例研究”在二体 B101 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孙飞宇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刚教授主持，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任评议人。

